

吃得好與吃得飽的鬥爭： 越南台資工廠的午餐政治

龔宜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劉桂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篇論文是從越南改革開放後外資工廠的午餐爭議出發，分析工廠午餐作為一種強制共餐，如何內化於半邊陲的台資威權式與階級種族化的勞動體制之中，進而觸發了接合階級與民族主義的工人午餐抗爭。在越南政府作為「工人國家」與依賴外資的政經脈絡下，具有維生道德意義的工人午餐抗爭促使政府開啟了與食物權相關的保護主義集體協議空間，作為勞資雙方「橋梁」的越南政府，試圖以受限的7c/NQ-BCH號決議來調解勞資階級對立關係。此協議性質而非法律的議案，讓工人的食物權高度依附於資方的善意與否，不滿於資方固守以米飯「吃得飽」的供餐原則，工人只好藉由每日的午餐政治持續對台資抗爭施壓；除了訴求吃得好的得體午餐外（午餐質量與公平性），由於劣質的工作餐通常是與台資工廠嚴苛的勞動條件共變，因此可藉由日常「吃飯」瑣事來開啟其他勞資議題的協議空間，具體化了台商所說的越南工人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叛意識。相當程度來說，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爭結合了馬克思式和博蘭尼式的抗爭行動，午餐權利抗爭是交織在階級認同與跨越階級的民族認同之中；一方面，反對經濟剝削，抗議台資提供無法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劣質午餐，另一方面，反對勞動力商品化帶來的個人和社會災難，抗議種族差異化的劣質工作餐所內含的對工人及社會的貶抑。

關鍵詞：越南台商、工作餐、強制共餐、日常政治、工人行動主義

台灣社會學第45期（2023年6月），頁1-53。

收稿：2023年3月29日；接受：2023年11月9日。

* 通訊地址：54530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Email: ickung@ncnu.edu.tw, liougueyling@gmail.com

Decent Meals versus Poor Food: The Politics of Workplace Meal and Taiwan Capital in Vietnam

I-chun K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Kuei-ling Li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workplace meal at Taiwan factories invested in Vietnam. We analyze how the factory lunch, as a kind of coercive commensality and internalized in the authoritarian and ra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of Taiwan capital, triggers the workers' lunch protests that articulated class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a context where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is a socialist state and dependent on foreign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the workers' lunch protests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open political space for a food rights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draft Resolution 7c/NQ-BCH tried to mediate the lunch antagonism between Vietnamese workers and Taiwan capital, however the nature of this Resolution is a CBA, rather than law, which makes the workers' food right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goodwill of the capital. Dissatisfied with the capital'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feeding enough", the workers have to apply persistent pressure to the Taiwan capital through everyday politics to improve lunch quality. In addition to appealing for a decent lunch (marked by lunch quality and fairness), the poor quality of the workplace meal is always co-variable with the harsh working conditions in Taiwan factories, such that everyday lunch politics also serves as a mean to open up space for other labor issues. Hence, the lunch politics provides an instance of what Taiwan capital perceives as the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of Vietnamese workers who oppose just for the sake of oppos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workers' workplace meal resistances is a combination of Marx-type and Polanyi-type protests in that the workers' struggle for food rights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class identity and the broad-based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the protest is again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or quality food provided by Taiwan capital that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labor reproduc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gainst the human and social disaster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and a protest against the degradation of Vietnamese workers and society as evidenced in the racially differentiated poor quality workplace meals.

Keywords: Taiwan capital in Vietnam, workplace meal, coercive commensality, everyday politics, labor activism

一、前言

2016年一家位於越南河內的港資玩具公司 Chee Wah，因午餐問題導致約 1,600 名工人於 8 月 16 日集體停工。¹ 根據報導，工人罷工的理由，一是公司未提供衛生安全的午餐，二是公司提供文房員工與生產線工人有差別待遇的午餐。Chee Wah 的工人控訴公司供應的午餐已屢屢在衛生上出問題；更讓工人不滿的是，午餐有文房（行政單位）和工人（直接生產）之別，工人提到：「我們知道他們吃的白米比我們好，菜也比我們好，魚露也不一樣。我們只能忍耐吃一吃然後繼續工作，雖然深知它不能保證是衛生健康的食物」。事件開始於 8 月 11 日的午餐，工人發現午餐食物中的兩道菜有白蛆，馬上呈報工團² 與公司高層，卻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8 月 15 日工人再次向工團與公司高層提出公司供應的午餐必須做好衛生保證，並要求行政人員與生產線工人應該有平等的午餐。但是，工人的要求仍未被受理，1,600 名工人乃於 8 月 16 日 12 點 30 分進行同步罷工，要求公司妥善的處理。之後，公司高層與 20 位工人代表協商後提出承諾：公司會依照食物衛生安全規定供應午餐，並同意按照規定進行午餐品質檢查；公司也會平等地供應午餐給文房和工人，統一供餐，不再有分別。

越南工人的午餐抗爭，同樣發生在韓資工廠。例如，2004 年韓資 Shilla Bags 公司管理階層強迫工人購買餐廳供應的腐壞食物，引起工人自發的抗爭行動，決定罷吃，女工們當場折斷桌上所有的竹筷子

1 Vu 1.600 công nhân Cty ngừng việc vì nghi thức ăn có giòi: Suất ăn ngon hơn, có nhiều thức ăn hơn (1,600 名工人因有蛆的食物停工：更好的食物，更多的食物)，Lao Động，2016 年 8 月 18 日，<https://laodong.vn/archived/vu-1600-cong-nhan-cty-ngung-viec-vi-nghi-thuc-an-co-gioi-suat-an-ngon-hon-co-nhieu-thuc-an-hon-686642.ldo>，取用日期：2022 年 9 月 1 日。

2 越南工會的最小單位為每個企業內的基層工會（越文稱為工團），目前每個企業僅有一個基層工會。基層工會必須受到企業所在之工業區、或地方的上級工會（稱為聯團）之指揮監督，此等上級工會是由地方政府派員組成，而總工會則是中央層級工會。

以示抗議，同時全體站起來，大喊食物壞了。之後，管理階層出面道歉，才允許工人可以購買外面攤販的食物進公司吃（Trần 2013）。2010 年 6 月，在韓資 Hansoll 成衣廠工作的越南女工阮氏深（Nguyen Thi Tham）寫了一封投訴信給當時越南總工會主席鄧玉松（Đặng Ngọc Tùng），信中揭露了工人在韓資工廠中嚴苛的勞動情境，之後信件全文以及鄧玉松的回函被登刊在勞動報（Lao Động）。³從信件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工人抗爭的焦點，包括薪資計算方式、不當管理與劣質的午餐，其中有關午餐的描述可以讓人深刻地感受到，Hansoll 的工人因午餐而遭遇到的階級與種族差異的受苦（suffering）經驗。阮氏深控訴公司：

規定禁止工人將個人物品、杯瓶、雨傘、帽子和外套帶到車間，進入車間必須關閉手機。這個公司在維修部門前掛了一個標語，上面寫著：「不歧視」，但實際上並非沒有爭議。辦公室行政人員允許攜帶個人物品，可以用水杯／水瓶喝水，無論是「公務」還是「私事」都可以使用手機。走到遙遠的公司餐廳時，他／她們可以撐傘和戴帽子遮陽，吃飯時也得到「全心全意」周到的服務。……（工人）喝水就得把嘴巴就著水龍頭喝，不知道他們把工人看成是什麼樣的動物，去吃飯時，頭頂著太陽，打傘戴帽子就得偷偷摸摸像小偷一樣。……吃飯的時候人多，一定要擠，爭先恐後，工人爭食像在「難民營」一樣。有的人為了一碗飯而落淚，端著一盤飯，彷彿在乞食。飯量像餵「貓」一樣，我不知道公司是否把我們當成「人」。

在越南的台資工廠中，類似的案例也層出不窮，2004 年台資紡

3 Lã thư đầy “uất nghen” của một công nhân（一封充滿「挫折」的工人信），Lao Động，2010 年 6 月 1 日，<https://laodong.vn/archived/la-thu-day-uat-nghen-cua-mot-cong-nhan-678071.ldo>，取用日期：2022 年 7 月 6 日。

織廠 Top One，工人抗議公司供應的午餐，菜與湯中有蛆蟲。工人控訴，工人是人類，不是狗和貓，應該有乾淨和得體的食物，而不是被污染的食物 (Trần 2013: 208)。10 年後的 2014 年 Top One 工人又因午餐而停工，近千名員工參與停工，要求公司提高工作餐的質量。工人提及，公司提供號稱 15,000 越盾／份的午餐，但工人經常吃到腐爛的食物，有時飯裡還有蟑螂和老鼠屎。工人們更進一步說到，時常連續幾個月，每週 6 天加班到晚上 9-10 點，那樣一頓飯，她們哪有體力工作？也曾多次向公司投訴，要求提高餐點質量，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為了證明她們所說的事實，在停工當天中午，工人向媒體端出了一盤食物，問道：「如果廚房不說這是炒豆腐、紅燒雞、青豆，那麼大家知道這是什麼菜嗎？在這裡，廚房餵什麼就得吃什麼」。⁴

台商也承認越南工人常因為午餐進行抗議，罷工或抗議通常從「吃」開始；抗議的起因可能是午餐少了「一顆滷蛋」，「飯沒煮熟」，或是食物中發現了「蛆蟲」，「我已經吃了一個星期餓肚子的蔬菜湯」，或者是因簡單又很抽象的「難吃」、「不好吃」而展開抗議。對台商來說，以上這些伙食團或菜不好吃的問題，其實是生活上的「瑣碎問題」，工人小題大作，他們就愛「不平則鳴」。從這種情況來看，工人與台商對工作餐 (workplace meal)⁵ 的重要性有著十分不同的看法，工人認真地看待工作餐的品質，認為是再生產的必要物資，甚至是作為「人」與「獸」區別的基礎，一份得體 (decency) 的工作餐表達了外資對工人同是人類的尊重。而對台商來說，工人對工作餐的抱怨就是生活瑣事，能吃飽就好，午餐抗爭往往是藉機鬧事。午餐為何會成為越南工人抗爭的目標或引爆點？工人這種「瑣碎的」午餐抗爭反應了什麼樣的階級關係？在目前已有的越南勞資關係研究中，尚未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越南工人的午餐

4 Tệ hại như... bữa ăn công nhân! (就像...人的飯菜一樣糟糕!) 2014 年 10 月 29 日, Người Lao Động, <https://nld.com.vn/cong-doan/te-hai-nhu-bua-an-cong-nhan-2014-1029215117109.htm>, 取用日期: 2022 年 8 月 5 日。

5 在台資廠中的工作餐，最主要是午餐的供應，因而在本文中提到的工作餐，主要指午餐。

抗爭看來不只是 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91 / 沈漢、王加豐譯 2002) 所形容的「肚皮造反」的問題，還與階層化的供餐、供餐的時間、餐點的品質、強制共餐有關；相對上與越南工人另一項重要的抗爭議題「管理不當」有異曲同工之處。對午餐和管理不當的抗爭都不純粹是經濟問題，也是為了人性／民族尊嚴、公平正義和自我保存等社會價值而抗爭。本文試圖以越南台資工廠午餐政治的分析來找尋上述問題的答案。

台資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前鋒，扮演著全球商品鏈中實現與傳輸剩餘價值的重要角色，與台資促成中國進入世界市場的角色一樣（吳介民 2019），半邊陲的台資也中介了越南與全球市場的連結，協助越南改革開放後第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在越南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勞資關係的顯著性展現在劇烈的勞資爭議與高罷工率，而其中台資工廠罷工件數的比例最高。2008 年以前台商一直是越南外資的第一位，之後投資金額與件數逐步落在韓國、日本、新加坡之後，⁶ 但是罷工的比例仍然高居不下。1995-2010 年間，全國外資罷工件數的前兩名是台資 38%、韓資 31%；2010-2016 年間的前三名是台資 31%、韓資 31%、中資 8%（Tran 2022）。越南總工會 2020 年曾指出，在勞動爭議中，除了工資和獎金外，最讓勞動人民感到緊迫的問題就是工作餐的品質。⁷ 2019 年對外資聚集的東南部經濟區 936 名工人的調查顯示，工作餐營養不足，不能保證食品安全，是工人參與罷工排名前三項的原因之一（Tran 2019）。這些資訊，顯示了工人十分執著於午餐吃什麼這件「瑣碎」的事。而從上文媒體揭露的午餐抗爭事件，可以看到越南工人對工作餐的不滿常見於位於世界體系半邊陲的東亞外資工廠中，本文試圖以越南勞資爭議的重要爆發點且在「媒體上消耗了

6 〈蛻變的越南 前行的台商〉，中央社，2018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8125002.aspx>，取用日期：2013 年 7 月 15 日。

7 BỮA ĂN CHO CÔNG NHÂN RẤT QUAN TRỌNG (*): Quyết liệt với bữa ăn giữa ca (工人餐很重要(*): 輪班用餐)，Người Lao Động，2020 年 10 月 8 日，<https://nld.com.vn/cong-doan/bua-an-cho-cong-nhan-la-rat-quan-trong-quiet-liet-voi-bua-an-giua-ca-20201007205959948.htm>。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大量墨水和紙張」的台資工廠為研究場域，藉由午餐政治的分析來拓展我們對工廠體制中工作餐制度化過程的理解，以及其產生的政治效應。本文具體的論證議題，在於分析台資工廠的午餐政治是如何交織在越南特有的國家機器、台資屬性、工人的階級認同和集體記憶／傳統與具體的勞動經驗中，以呈現越南台資工廠勞資關係的地方特徵；同時，也揭示越南工人在東亞半邊陲外資工廠可能遭遇的普同困境。

二、文獻討論與資料來源

根據 Benedict Kerkvliet 的研究調查，外資食堂所提供的食物對工人而言是一項痛處，儘管有些公司提供免費的午餐，不過通常是無味的，營養價值很低，有時候還供應被污染的食物；但是，有些外資卻禁止工人到公司外面用餐，甚至禁止工人自行帶食物到公司食用（Kerkvliet 2010）。如果說工人的午餐抗爭不完全源自經濟因素，那到底還有哪些因素影響工人的抗爭行動呢？本文將從幾個面向進行分析，包括工廠體制是如何佈署與安排工人的工作餐，越南社會主義政府對工人午餐／抗爭的治理，以及越南工人午餐抗爭的社會根源與動員方式。在以下文獻討論中，將聚焦於以上三個面向的相關理論觀點進行回顧與討論。

（一）午餐抗爭的場域：工廠食堂的強制共餐

吃午餐是生物性的，更是社會性的。共餐（commensality）簡單來說，是指一起吃飯（eating together）以及在同一張桌子上分享食物。研究者指出，一起吃飯分享食物是社會團結（solidarity）與社交性（sociability）的重要標誌，共餐因而有著社會整合的積極性，增加群體內部的團結，所以共餐通常伴隨著歡愉（commensality with conviviality）（Grignon 2001）。但是我們可能被迫和他人共用桌子用餐，大家坐在一起吃飯並沒有形成什麼社會關係，只是純粹地為了補充養分併桌吃飯（Simmel 1994; Symons 1994）。可見共餐未必都

具有正面積極、歡愉的意涵。Grignon (2001) 曾描述一種制度共餐 (institutional commensality)，將之視為以集體方式完成生物個體需求的物質任務和象徵性義務的聚集。在制度共餐中，群體所屬的機構基本上是封閉的，這種共餐原則有著嚴格的階層區分，反映的是機構的社會組成，例如軍隊、監獄等。而在學校和工廠的共餐，可以說是一種準制度 (semi-institutional) 共餐，它的產生可能來自於機構強加的分類和限制，或是來自社會慣例。Grignon 只對各種共餐形態進行分類描述，並未有實際經驗案例的研究，而 Watson (2011) 則進一步討論了歷史上曾出現的制度共餐，那是中國大躍進時代 (1958-60) 集體食堂中的「強制共餐」(coercive commensality)，也就是「大鍋飯」。當時毛澤東為了實施共產主義，認為必須消除私人家庭廚房，打破家戶共餐形成的家庭凝聚力，便以平等主義為由強迫人民必須到集體食堂吃大鍋飯。根據人們親身的負面經驗，大鍋飯不好吃又不衛生，經費短絀也造成食物短缺和品質下降。工人階層中出現有關大鍋飯的反政治宣傳與反文化霸權民謠，以幽默為武器，作為一種底層的抵抗。在本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台資工廠中類似的強制共餐，與大鍋飯相似的負面經驗與強制性，通常會引起越南工人的抗爭，資方與工人圍繞著午餐而產生的衝突，可說是名符其實的日常政治 (everyday politics)。

工人必須要進食，而強制共餐的資本邏輯是什麼呢？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順服的身體一章中談到了工廠體制，這種工業空間有著新的控制形式，實施嚴格的管理來獲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種不利因素，同時保護生產工具及駕馭勞動力。為了維持秩序和便於監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須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同時要消除人員的四處流動和無益或有害的人員聚集。工人在工作時間，不能聊天，不能吃東西等，甚至在吃工作餐時「不得講故事或進行其它會讓工人分心的談話」。因為工人在付薪時間內的勞動必須是高質量的，身體應自始自終投入生產中。對資方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工人浪費時間就是一種道德和經濟詐欺，Foucault 認為經由時間表的控制，從外施加

集體和強制性節奏，讓工人和工廠間建立起強制聯繫，便可以讓工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極限，汲取更高的利潤（Foucault 1979 /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135-167）。

這樣來看工人要吃飯，時間是一個問題，所以資方要有節省時間的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提到資本家為了節省時間，到了用餐時間也不讓工人離開機器，資方往往得在機器旁跪下來餵工人吃飯，因為機器不能停下來。資本家十分反對「至少在吃飯時間讓機器停下來」這樣的倡議；因為他們擔心喪失占有工人勞動的時間，從而喪失利潤。所以，資本家的辦法就是把午飯當成是勞動工具的輔助材料，添加到正在進行生產過程的工人身體中。馬克思反諷的說，資方刻扣吃飯時間，儘量把吃飯時間併入生產過程，因此對待工人像對待單純的生產機器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Marx 1876 / 吳家駟譯 1990: 295）。彭昉對中國台商的研究也發現，台商將宿舍和食堂視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衍生物，以掌控工人勞動的確切時間，確保工人每日投入生產過程的勞動量（彭昉 2006）。但是，當共餐作為一種社會／交活動，轉化為工業生產活動以釋出勞動力時，勢必會面臨社會活動與強制共餐間的矛盾，在安排與佈署每日多達數萬人，少至數百人的工作餐時，勢必對工人身體、個體差異、口味偏好予以否定，找出最低限度的共同點，吃飽就好；這樣的午餐很難不造成騷動，或台商口中的藉機鬧事。

（二）午餐政治與集體協議的空間：政府與工人間的食物供應政治

在傳統社會中，支配者與從屬者間的食物供應政治（politics of provisions），通常是討論在一個共同體中，如何經由社會／政治習慣以及社會關係決定的「道德經濟」來保障從屬者的維生權利。例如，Scott 討論二十世紀初越南農村的道德經濟時，指出地主與農民間的食物供應政治，考慮的是農民作為一名消費者而不只是生產者，農民吃飯的維生權利是不能憾動的，其中饑餓會召喚正義。Scott 曾

指出，「從農民日常生活食物攝取中也許可以推演出他的政治活動」（Scott 1976 / 程立顯、劉建等譯 2001: 242）。而在當代社會，社會群體與統治者之間的食物供應政治，國家政策往往取代了實作的習俗傳統，但是，人民吃飯的權利仍難以撼動。在一些政體中，尤其是威權政體，食物供應政治作為一種社會契約，它的實踐與否更直接影響著這個威權政體的正當性與穩定性，政府必須要能確保人民的糧食安全。例如，在孟加拉軍方所支持、未經民選的政權下，各種抗爭活動都被禁止，但即使這樣，憤怒的饑餓人民還是可以上街抗議負擔不起食物（Hossain and Jahan 2014）。這似乎意味著，維生權利的實踐與否與政府的正當性危機密切相關。這樣的現象也顯示麵包和奶油的問題是底層階級政治與抗爭的本質所在，發生糧食騷亂時，如果威權政府的保護主義契約被群眾壓力所激活，公共當局就可能採取保護維生權利的行動，食物騷亂將開闢出「協議的政治空間」（political space for bargaining）來解決饑餓問題（Bohstedt 2014）；或如 Hobsbawm（1952）提到的「藉由騷動而促成的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抗爭迫使統治者採取行動。這些觀點意涵著食物權所訴諸的道德力量更能突顯抗爭的正當性，同時更能打開異議各方集體協議的政治空間。那當代越南社會主義國家的食物供應政治是由哪些因素所主導？

越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工人國家」，曾經歷 1975 年統一之後十年間社會主義集體化生產的失敗，糧食供應嚴重不足，造成了北部多達 930 萬人面臨饑荒（Pham 2006），這是越南政府放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走向改革開放的原因之一。1986 年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後，越南憲法第 25 條即承諾提供外資穩定安全的投資環境，以實現國家發展目標。⁸ 但是，越南社會主義政府的正當性也建立在與工人階級的社會契約上，如憲法第 4 條就載明，越南共產黨是工人階級

8 Hiến pháp năm 2013（2013 年憲法），LuatVietnam，<https://luatvietnam.vn/tu-phap/hien-phap-18-2013-l-ctn-quoc-hoi-83320-d1.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7 月 19 日。

的先鋒隊，忠實代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整個民族的利益。第 10 條更規範了代表工人階級之越南總／工會（*Tổng Liên đoàn Lao động Việt Nam*），照顧和保護工人合法權益的任務。此外，越南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除了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外，還有另一重要的正當性基礎，亦即民族主義的社會契約。當初胡志明的越盟及後來的越南共產黨的革命，主要是以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號召來動員越南人民。相當程度來說，當前越南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很大成分是來自對越南去殖民化與國家獨立的貢獻。

學者們分析在市場經濟脈絡下，面對外資與工人間的對立時，越南官方似乎更偏袒和支援工人而不是資方，對罷工的鎮壓也很少見。他們認為官方容忍罷工的原因是，工人的抗爭訴求只限制在勞動條件上，並未外溢到其他威脅黨國的政治性議題，且組織性很低。另一個原因則是，越南社會主義政府認為維護工人權益對其作為工人國家的統治正當性至關重要。基本上，面對工人的抗爭處境，政府是以回應、容忍和壓制的混合方式來處理，Kerkvliet（2019）將之定位為「回應式的壓制性」國家（*responsive-repressive state*），王宏仁（2019）則稱之為「防禦威權主義」政府。而工人也會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在抗爭時對執法者召喚民族情感尋求支持；或是指責越南共產黨屈從於新殖民主義，對其施壓並挑戰其統治的正當性。工人即曾批評地方政府在工人背上鋪紅地毯歡迎外資，以犧牲工人為代價（Do et al. 2006）；《勞動報》在工人罷工時會批評政府勞動部門對外國資本卑躬屈膝，犧牲數百萬工人。越南異議人士 Nguyen Dan Que 博士接受有關罷工的訪問時提到，「戰爭期間，農民和工人犧牲的血汗最多。在和平與發展時期，河內政府卻以最便宜的價格出售越南工人」。⁹

9 Làn sóng đình công tại Việt Nam theo nhận định của Bác sĩ Nguyễn Đan Quế (Nguyễn Đan Quế 博士分析越南的罷工浪潮)，Radio Free Asia，2006 年 2 月 5 日，https://www.rfa.org/vietnamese/in_depth/DrNguyenDanQueOnStrikeByWorkersFDIcompanies_NAN-20060205.html，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既依靠一黨威權又依靠社會契約統治的越南政府，當遭遇憤怒的外資工廠工人因食物而抗爭時，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社會契約是否會被群眾壓力所激活，而打開政治談判的空間？不是打壓工人而是協調出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的政策？亦即越南政府有無可能將保護主義和勞動力商品化兩項相互抵觸的利益融合在一個制度之內？保護主義原則是要保護勞工免於資方／市場的危害，但勞動力商品化卻迫使他們以出賣勞力謀生。本文的討論，將聚焦於越南工人階級的食物供應政治如何在越南社會主義政府對外資的依賴與工人間的社會契約脈絡下展開，具體分析越南政府與工人之間食物供應政治的決議文，越南總工會 2016 年發布的 7c/NQ-BCH 號決議 - 「工人工作餐品質」（*Chất lượng bữa ăn ca của người lao động*），探討影響「工人工作餐品質」決議制定的因素、執行過程、政經效果，以及越南總工會對午餐相關勞資集體協議（CBA）的倡議。

（三）解釋越南工人的午餐抗爭：跨國資本與越南工人的行動主義

為什麼在越南社會主義一黨制中，公開抗爭成為突出且持久的政治特徵？午餐抗爭成為日常政治，基本上，也是出現在這樣的脈絡中。Sui Kaxton 與 Anita Chan 指出，越南不僅因其驚人的經濟增長引人關注，持續不斷的罷工行動也是世人注目的焦點，在其他亞洲國家，甚至鄰國中國，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多的罷工報告（Sui and Chan 2015: 71）。有關工人頻繁的「不平則鳴」公開抗爭的行動主義，大多數的學者是以國家與社會（工人）的關係來解釋行動的可能性（Kerkvliet 2019；王宏仁 2019）。如前文提及的 Kerkvliet 認為越南「回應式的壓制性」國家機關的特質，所形成的國家—工人關係，為工人的行動主義創造了可能的政治空間。Joe Buckley（2021a）則是以自發抗爭來解釋越南工人的行動主義，因為自發的戰鬥式（*militant*）未遵行合法罷工程序的野貓罷工，對資方形成的壓力往往是有效的，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委託進行的 2011 年有關越南

罷工的調查，在 92% 的罷工中雇主接受了工人的所有要求（Do 2017: 1058）。相對於 Kerkvliet、王宏仁等學者採用國家—工人關係視角來分析越南大量的野貓罷工，Buckley 採取的是資本—工人關係的觀點來討論此議題，這種論點強調工人自主及行動主義的罷工是源自資方的行為，勞資對立關係形塑了越南工人的戰鬥性，因而要解釋工人的戰鬥性，應該是去了解階級關係的配置（arrangement），尤其是資本違反勞動法規的種種行為和態度（Buckley 2021b）。那越南台資的勞資關係特徵是什麼呢？

根據已有關於越南台資勞資關係的研究，雖然沒有明確定位台資的勞動體制，但是從文章中勞資現象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其傾向專制式的勞動管理。複製來自中國的管理方式，為汲取利潤的最大化，以威嚇強制的管理方式來取得工人的從屬性，儘管遭遇到以往在中國未曾經歷過的激烈反抗（Sui and Chan 2015）。或者指出在核心國際買家驅動的全球生產壓力鏈結構下，促成半邊陲越南台資工廠對高勞動強度的要求，形塑出高壓專制的勞動控制方式（王宏仁 2019）。另有研究者指出，台資管理者缺乏對工人理解和同情的敏感性，資方就是施展權力的人，通常會強迫員工服從他們，對台資來說與工人協商和讓步是羞辱和不可接受的行為（Tran 2022）。甚至有研究提到台灣的管理者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知識甚少，且具有軍事性格，有時表現在對工人的身體暴力上（Anner 2017）。而在媒體報導的台資廠罷工事件中，資方嚴苛的勞動條件、不當管理通常會和劣質午餐同時出現，這似乎意味著工人的午餐抗爭與資方的管理專制化傾向共變，我們嘗試解析台資勞動體制與午餐爭議之間的關係。

此外，上述的解釋主要是以政府與資方的行動來分析越南工人的抗爭活動，而非以工人的視野為出發點，無法說明罷工的行動主體——越南工人為什麼頻頻罷工，工人戰鬥性的社會根源是什麼呢？其行動主義是立基於什麼樣的階級構成和團結？基本上，本文比較想進一步探索的是，是什麼樣的價值引發了越南工人的「不平則鳴」？亦即工人作為行動主體，其行動主義的根源除了物質性的不滿外，還以什麼

樣的價值理念來正當化其抗爭行動？而這樣的價值理念又源自什麼樣的歷史脈絡？Trần (2013) 曾討論越南工人的抗爭行動，她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工人抗爭，一種是馬克思式，是指新興工人階級在生產點面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另一種是博蘭尼式的抗爭，基於不受管制的勞動力市場對社會實體的破壞，她提到越南的情形是，工人反對勞動力商品化對人類尊嚴、正義和自我保存造成的破壞。當我們將這兩種抗爭放到台資工廠午餐政治的研究時，馬克思主義式階級抗爭，主要探討的內容是針對強制共餐所內隱的經濟剝削。而另一類，博蘭尼式反商品化的抗爭，工人成為有效的行動者，不只是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也不一定是發生在生產點上，例如，抗爭出現在食堂中，是為了捍衛個人尊嚴、得體的飲食和對越南社會的尊重。

基本上，博蘭尼是以「整體性」(totality) 的角度來分析勞動力的商品化，他反對在分析人的利益時區分物質需求與理想關懷。對他來說，勞動力的商品化會影響到人類個體這項商品的承載者，也就是說當在市場出售或處理一個人的勞動力時，將涉及承載者「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實體。他認為工業革命造成驚人的社會混亂，而貧困問題只是這一事件的經濟方面，它也會破壞既定的社會、文化和生態關係。因而，他強調階級分析不應採唯經濟論的觀點，只著重勞工階級的經濟處境，因為文化災難比經濟剝削更為重要，例如，工業革命在不到半世紀就把大量的英國鄉村人民由定居轉變為不受保護的市場商品並遭受到文化衝擊。不受管制的勞動力商品化，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相應的「保護社會」的反運動，來調節和約束由市場所造成的文化破壞，限制文化衰退的程度，這代表的不只是市場的階級利益和經濟原則，而是社會的普遍需求 (Polanyi 1957 /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 1999)。如果以博蘭尼整體性的觀點來看台資與越南工人的關係，當工人因出售勞動力而從屬於資本的支配時，作為承載勞動力的工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實體也將經歷文化從屬化的過程，這是勞動力商品化內生的暴力過程。如果勞動力這個商品被過度使用、不加區別的使用、任意對待時，工人除了反對經濟剝削外，也會出現反對文

化從屬化之社會關係的防衛行動。越南工人源於食堂的午餐抗爭，部分原因即是為反對不體面、種族差異和不當對待的供餐，找回作為人的尊嚴。

此外，博蘭尼式反商品化的抗爭強調跨越階級利益，形成政治聯盟來捍衛個人和社會利益。Beverly Silver 在《工人的力量》（*Force of Labor*）一書中也指出，傳統工人研究忽視或淡化了種族、民族、性別和國籍在階級形成中的地位，工人的身分和認同，以及在生產點之外的各種生活經驗，應被認為是集體／團結行動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干預變數。也就是說，工人會援引可以對資本施加壓力的各種身分組合（如年齡、性別、種族和地緣），父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工人運動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ilver 更進一步指出，工人會劃定非階級邊界和界限，作為要求保護的基礎，即在非階級基礎上構建排他性階級身分，例如，工人強調公民身分而非階級，藉助國家的干預爭取集體權益。當援引民族主義時，工人所依賴的不是工人在生產點的力量，而是依靠與整個共同體跨階級的聯盟。例如，1920 年代印度和中國紡織工人的行動主義，是與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Silver 2003）。那越南工人進行午餐抗爭時，如何讓相關的社會成員感知到他們經驗多樣性之間的某種統一，以組織有效的政治行動。也就是說，工人抗爭的勝算機會在於他們是否能取得階級之外成員的支持，這又取決於他們的訴求能否超越本階級的利益。那在午餐政治中，越南工人會訴諸什麼樣的普遍利益來連結工人之外的社會群體呢？而在抗爭進程中，相較於馬克思式的抗爭，博蘭尼式抗爭的訴求是否更能迅速擴展團結行動，而成為越南工人行動主義的特徵？

本篇文章的主要資料是由 2017-18 年科技部支持的「越南台商的在地聯結：政商關係、勞動形構與生產性摩擦」計畫延伸而來，資料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移地研究的訪談資料，另一部分是越南總工會與越南媒體的文獻資料。移地研究的部分，共搜集了 11 家台資公司的工作餐資料（表 1），經驗資料的取得主要是經由對 11 家台資

表 1 台資工廠午餐供應表

公司名稱	越籍員工人數	午餐費 (VND)	備餐方式	工作餐權益	午餐時間	中/台籍與越籍員工共餐	台資午餐爭議處理方式
A 公司	1,300	17,000	自己煮	強制共餐	1 小時	一樣菜色，同食堂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餐廳設立投訴箱 食堂門口提供每日午餐樣品，排隊動線規劃
B 公司	272	20,000	外包	強制共餐	1 小時	分開吃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外包商
C 公司	300	22,000	外包到公司煮	強制用餐	30 分鐘	同菜色，不同煮法	每月召開伙食會議
D 公司	13,000	19,000	2 家外包商	強制共餐	1 小時	同樣在食堂吃，提供中餐窗口，午餐單價相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食堂門口提供每日午餐樣品，排隊動線規劃 衛生安全部門每日抽檢 現場工人代表參加與午餐外包商的每月例會 向外包商開單懲罰 事先公布一個星期的供餐表
E 公司	1,000	20,000	包商到公司煮	強制用餐	1 小時	分開吃，有廚師煮台灣口味的菜供台灣人吃	更換包商
F 公司	5,000	17,000	外包	午餐可外食不補餐費	1 小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分開吃，台/中籍有自己的餐廳，吃自助餐 越幹和工人一起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每日派一、二位外幹跟員工一起吃 事先公布一個星期的供餐表 公司衛生人員餐前檢查食材與拍照，保留樣品
G 公司	790	24,000	外包到公司煮	強制用餐	1 小時	一樣菜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要求管理部確保食品品質、數量、溫度和衛生 工會參與食堂品質控管

(續下頁)

公司名稱	越籍員工人數	午餐費 (VND)	備餐方式	工作餐權益	午餐時間	中/台籍與越籍員工共餐	台資午餐爭議處理方式
H 公司	7,000~8,000	幹部食堂 29,000 工人便當 25,000	外包	可以補未用餐的餐費	幹部 90 分鐘 工人 30 分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分開吃，台籍和越籍、中國籍吃不一樣的菜色，台籍在招待所餐廳吃自助餐 越幹和陸幹在第一與第二員工餐廳用餐 現場和輪班人員以吃便當為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伙委會每月定期與經辦部門開會、檢討菜色 每年辦理外包商評鑑，選擇優良廠商承攬、變換菜色 食堂設置員工意見反映箱
I 公司	300	15,000	外包	強制共餐	30 分鐘	分開吃，外籍幹部在宿舍吃桌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每星期意見調查 工人參與外包商更換 人事、工會幹部和工人一同用餐
J 公司	250	25,000	外包到公司煮	強制共餐	30 分鐘	分開吃，外籍幹部公司請廚師煮，吃桌菜	換菜單、換外包商
K 公司	1,000	13,000	外包	強制共餐	30 分鐘	分開吃，外籍幹部在宿舍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工人代表參與伙食委員會 副廠長下來和工人吃午餐 每課每天抽籤一名工人 11:30 去檢視菜色 事先公布一個星期的供餐表 白飯要足夠 排隊取餐不要太久

資料時間說明：A-J 公司的經驗資料是 2018 年的情況，K 公司的受訪者描述的是 2011 年於公司任職時的情況。

公司的台商／幹、越南幹部、越南工人的訪談而得，同時也訪談了西寧 T 加工出口區工會主席與幹部。2021 年疫情期間，為更進一步了解工人對午餐的看法，但因無法赴越進行移地研究，乃以開放式問卷請 11 家台資廠中的 B 工廠與 C 工廠各 10 位工人填答有關工作餐問題。此外，文獻資料主要是來自越南總工會以及各媒體網站，其中《勞動報》（Báo Lao Động）是越南總工會的機關報，是最積極的親工人報紙。《勞動者報》（Báo Người Lao Động）是胡志明市工會的機關報，《青春報》（Báo Tuổi Trẻ）是胡志明市共青團的機關報，《青年報》（Báo Thanh Niên）則是越南聯合青年聯盟的機關報。這些報紙每日都有關於勞工議題的報導，提供了本文許多重要的資料。本文的作者之一，由於長期從事越南相關研究，搜集了許多台商／幹、越南工人與地方工會幹部的訪談，因此，本文也使用了過往搜集的訪談資料中與工作餐相關的資料。

三、台資工廠工作餐供應體制

（一）勞資關係緊張的午餐時刻：食堂中的工作餐

台幹小琳在 2007 年，從台灣前往越南工作，抵達的第二天吃了第一份台資工廠午餐，當時她只夾了些菜、配上幾口飯後，就整盤飯菜幾乎原封不動的倒進廚餘回收桶。她說，在越南吃工廠的飯菜，也不是想要吃飽就能吃飽的，要能吃得下去才會吃得飽。她可以倒掉飯菜，但是現場的工人卻不能這樣做！當時那間台資工廠用餐的地方是一座臨時搭建的茅草屋，正午時分溫度近攝氏 35 度，十分酷熱難耐，草棚下幾支大型工業用電風扇呼呼的吹著，主要的功能是加速熱空氣對流和驅趕蚊蠅，若要以此吹乾現場員工的滿身大汗也行得通，但若是想降低酷熱所帶來的不適，幾乎是有限。工人中午用餐與休息時間總共是 30 分鐘，全廠兩百多人分成兩班輪流吃飯，辦公室人員被分配在第二批用餐，大家拿著餐盤跟著排隊，大約排隊 10 分鐘後才會輪到取餐。午餐外包商的服務人員在餐盤裡挾進了幾塊肥肉居多

的水煮三層肉、小黃瓜切片、蒜頭炒空心菜和一片西瓜，接著用大湯匙盛起白飯，湯則是打好放在餐檯上，一碗一碗的讓員工們取用，湯碗裡的湯料就只是兩、三片菜葉而已。餐桌可明顯地看到著淺藍色短袖上衣的越南籍工人和著白色長袖上衣的台幹及陸幹分桌而食。在白色長袖上衣的餐桌還擺著肉鬆、醬瓜和花生麵筋，品管部門主管告訴小琳，在這裡吃飯，口味不太習慣的話，就配點肉鬆、醬瓜和麵筋；而在越南籍工人的餐桌上則擺放著魚露、醬油和辣椒醬。這樣的午餐，一份是 7,000 越盾，折合台幣約十幾塊錢，算是很粗陋的午餐；當時，一份夾有兩顆荷包蛋的法式麵包（bánh mì）就要 8,000 越盾。

對小琳來說，除了不習慣菜的口味外，米飯是冷的，又乾又硬，還稍微帶點蟑螂味，這才是讓她很難把飯吃完的主因。隔壁桌的工人則是在米飯上淋上醬油、將一條生辣椒壓成碎片拌入空心菜裡，一口空心菜配上好幾口飯，吃下一份午餐。那工人為什麼要硬吞下這樣的午餐呢？小琳提及，工人早上若只吃一份法國麵包或者糯米飯，十點多就會餓了，外加公司有門禁管制，中午要外出必須向公司申請、登記，十分麻煩，吃飯加休息時間只有 30 分鐘，員工們為了有體力接續下午的工作，只能靠公司的那頓午餐，所以工人雖知午餐不好吃，但為了身體所需也必須吃飽，尤其是依賴大量的米飯。小琳的這段經歷，其實是許多台資工廠典型的午餐樣貌；包括了廉價外包的工業式午餐、貧乏的午餐質量、半強制的共餐、緊迫的用餐時間、炎熱的用餐環境以及餐點的階級／族群差異等。

對提供午餐的資方來說，中午吃飯真的很恐怖，每天要提供數百人到數萬人用餐。例如，韓國三星電子 2018 年時，在越南北寧和太原的兩家工廠共有 11 萬名工人，每天提供約 17 萬份工作餐（30,000 越盾／份）。¹⁰ 許多台商在午餐時刻要擔心無法準時供餐、怕飯沒煮

10 Cạnh cảnh bữa ăn trưa của công nhân tại cảng-tin Samsung Việt Nam (越南三星工人食堂午餐特寫)，Báo Điện tử VOV，2018 年 7 月 20 日，<https://vov.vn/xa-hoi/can-canh-bua-an-trua-cua-cong-nhan-tai-cang-tin-samsung-viet-nam-789926.vov>，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熟、擔心蒼蠅太多被抱怨等，而引起工人鼓譟。C 公司台幹曾提及，有一次午餐的主食臨時以麵條代替米飯，工人非常生氣，她說：

用餐時整個餐廳是躁動的，很多人坐下沒多久就離開餐廳，離去時還用力甩椅子，口中念念有詞以表達不滿的情緒，這和平常用餐的氛圍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已經每桌去解釋說明，飯鍋突然壞掉，米煮不熟才改吃麵條，還每人補上一包泡麵作為補償，但是員工的怒氣還是難以抑止。

她不太了解為什麼工人會這樣反應？她說，難道吃麵條就不能吃飽嗎？只有米飯才能吃飽？員工們還不是常在街上吃河粉、米粉湯，也把這些食物當成正餐來吃啊？以工人的反應來看，到底是對午餐的內容不滿，還是另有其他原因？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李天柒曾歸納工人罷工醞釀的前兆，其中一項便是拒絕吃飯，以小問題挑起集體反抗。¹¹ 台商鄭先生也說，工人習慣從吃的問題發動罷工，公司吃的其實比家裡好，但卻不滿意。我們訪談的工廠工人大都很在意午餐的品質和內容，D 公司的越籍幹部提到，工人抱怨午餐不好吃，很正常，每天都有。J 公司的阿明提到每次開會時，「都講那個吃飯，不好吃啊！這個菜不好，這個菜不要煮，哪個菜要煮。真得講一天講不完。工會也很多意見。10 個人有 11 個意見。廚房也很麻煩」。T 工業區的工會主席說外包煮好送到的餐點，大多數已經用餐盤分好，通常已經冷掉，很乾，工人認為這種午餐不能吃，並覺得公司不照顧工人。K 公司的阿國抱怨，菜不是用油炒的，而是用水燙過而已，三層肉都是肥肉。F 公司的阿賢說，工人大多認為午餐不好吃，用太多豬油，有菜蟲，會拍照放在 FB 上。H 公司的員工嘲諷午餐吃的魚肉，那條魚在冷凍庫的時間，比牠活在水裡的時間還久。G

11 〈發生罷工時的處理要領〉，Linda 網誌，2011 年 7 月 6 日，http://hrluncheon.blogspot.tw/2011/07/blog-post_06.html。取用日期：2018 年 2 月 20 日。

公司的台幹也提到，「每次開會都有關於吃飯的不同聲音，就是怎麼吃那麼差，要提高金額啊」。而 B 公司填答問卷的 10 位工人大都表示午餐很難吃，有 8 位工人希望公司能給午餐津貼替代午餐的供應。

在越南總工會的資料與各新聞媒體的資訊中，往往也可以看到許多有關工作餐的訊息。胡志明市工業區工會 2020 年曾舉行「工人工作餐質量」座談會，與會的國家營養研究所副所長 Le Bach Mai 指出，部分工業區工人的膳食構成中，只有 12% 的熱量來自蛋白質，16% 來自脂肪，其餘 72% 都是來自碳水化合物，如米飯。胡志明市工業區工會代表進一步提及，區內工人的工作餐分為三組，¹² 美國和歐洲企業是第一組（超過 3 萬越南盾／份）；日韓企業是第二組（2 萬至 3 萬越盾／份）；台灣企業是第三組（1 萬 5 千至 2 萬越盾／份）。工會代表還表示，這其中最低的是台資的紡織／成衣企業，食堂沒有空調，午餐只能滿足飽腹的需求。而在媒體報導的工作餐爭議中，不乏為國際知名品牌代工的台資工廠，抗議原因有餐費太低、質量差、不准帶自己的食物、食物中有異物、階級化的供餐等。例如，鞋廠賜昌 2005、2013、2015 年的罷工都與午餐品質太差有關。¹³ 2002 年成衣廠廣越工人抗議刪減午餐費用以及工人與行政人員間餐費的不平等。¹⁴ 2010 年寶成，有 1 萬多名工人罷工，主要是抗議午餐費用只有 4,000 越盾／份不合理，¹⁵ 當時一杯工人咖啡都要 3,000 越

12 Bữa ăn chỉ 11.000 đồng, sao công nhân đủ sức làm việc? (這頓飯只有 11,000 越南盾，工人怎會有足夠的工作能力?)，Người Lao Động，2020 年 10 月 13 日，<https://nld.com.vn/cong-doan/bua-an-chi-11000-dong-sao-cong-nhan-du-suc-lam-viec-2020-1013100354994.htm>，取用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

13 Thay đổi thực đơn hằng ngày (每日更改菜單) Người Lao Động，2013 年 6 月 3 日，<https://nld.com.vn/ban-doc/thay-doi-thuc-don-hang-ngay-20130603095812520.htm>，取用日期：2022 年 9 月 7 日。

Bữa cơm nuốt không trôi của công nhân Việt Nam (令越南工人難以下嚥的一餐)，VIETINFO，2015 年 8 月 15 日，<http://vietinfo.eu/tin-viet-nam/bua-com-nuot-khong-troi-cua-cong-nhan-viet-nam.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9 月 7 日。

14 Trên 5.000 công nhân Công ty May Quảng Việt đình công (廣越服裝公司 5,000 多名工人罷工)，Người Lao Động，2002 年 8 月 16 日，<https://nld.com.vn/cong-doan/tren-5000-cong-nhan-cong-ty-may-quang-viet-dinh-cong-45101.htm>，取用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15 Bữa trưa 4.000 đồng! (午餐 4,000 越南盾!)，2010 年 9 月 4 日，Người Lao Động，<https://nld.com.vn/cong-doan/bua-trua-4000-dong--20100408113238372.htm>，取用日期：2022 年 9 月 7 日。

盾，工人以此嘲諷這是一家有「外資」美譽的工廠。2018 年台資皮件廠 Yamani Dynasty 工人罷工的訴求反映了台資強制共餐的特徵，要求提高 11,000 越盾／份的午餐費用，加班到晚上 8 點應該供餐，孕婦可以帶牛奶進工廠以補充營養。¹⁶ 2021 年台資鞋廠 Viet Glory，工人罷工，要求加薪、提高工作餐費至 20,000 越南盾／份、提供加班餐等。¹⁷

工人控訴的工作餐質量太差，到底指的是什麼？以表 1 我們在 2018 年訪談的 A-J 這 10 家台資企業來看，雖然規模大小不一，但是可以觀察到各廠工作餐的共同點，餐費成本都高於總工會工作餐決議的 15,000 越盾／份，多數採工業外包商備餐，種族／階級差異的供餐，30-60 分鐘的用餐時間，強制工人在工廠用餐，以及每家企業都無法避免工人對午餐的公開抱怨、抗議或要求再改善。只有 H 公司是以津貼形式提供餐費，吃多少扣多少；但因午休時間有限，也很難外食。顯示午餐的爭議普遍存在，而且主要是日常抗爭的形式而不是罷工。至於午餐的內容，較大規模的公司食堂會提供數份套餐，工人先到食堂門口的午餐樣品櫃中選餐，之後依循套餐號碼的地面動線排隊取餐；小公司食堂則會準備兩樣不同的主菜讓工人選擇。典型的台資午餐是三菜一湯，一個主菜（肉品），一個配菜，一個青菜以及湯，再加上放在桌上的瓶裝魚露，有的公司每隔幾天會提供水果與飲料（如圖 1 至圖 2）。這些午餐通常是由工業餐商烹調的標準化午餐，無法參照個人的飲食傾向來烹調，只能基於最低限度的供餐準則，通常是貧乏和單調的。

再加上，由外包工業餐商烹調的午餐，其間涉及了人事成本、佣金，還有給食品衛生管理局的紅包等支出，使得工作餐是以「低價訂

16 Vu 4.000 công nhân ở Nam Định ngừng việc: Công ty chưa đáp ứng hết yêu sách (南定 4,000 名工人停工事件：公司未完全滿足要求)，Lao Động, 2018 年 3 月 26 日，<https://laodong.vn/cong-doan/vu-4000-cong-nhan-o-nam-dinh-ngung-viec-cong-ty-chua-dap-ung-het-yeu-sach-597707.ldo>，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17 Vì sao hàng nghìn công nhân may ở Diễn Châu đình công? (為什麼濱州縣成千上萬的縫紉工人罷工?)，Nghệ An, 2021 年 2 月 18 日，<https://baonghean.vn/vi-sao-hang-nghin-cong-nhan-may-o-dien-chau-dinh-cong-post235745.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



圖 1 B 公司 20,000 越盾的午餐

圖片來源：B 公司員工提供。



圖 2 C 公司 22,000 越盾的午餐

圖片來源：C 公司員工提供。

餐，高價發票」（*đặt cơm giá thấp, nhưng xuất hóa đơn giá cao*）的方式出餐（一份 12,000 越盾的午餐，可以開出 15,000 越盾的收據）。根據 2017 年胡志明市一家工業餐商 H 女士分析，12,000 越盾／份午餐，公司會扣除 10% 的增值稅，支付 10% 的佣金給訂餐者，再扣掉工資、水電、煤氣、交通等各種費用，最後，每份午餐可用金額只有 7,000 越盾左右。其中，菜錢 6,000 越盾，飯錢是 1,000 越盾。¹⁸ 層層剝削後的工人午餐，如同平陽省食品安全衛生廳廳長 Nguyễn Văn Đạt 所說的，「剩下給工人吃的都是白飯！」；¹⁹ 而這些「白飯」通常是由隔夜泡漲的劣質米煮成，阿國說「又乾又硬，真的很難吃，整個月偶爾才會吃到一次比較嫩的白飯」。

工人們提到，做了整個早上，吃飯時看到乾冷乏味的午餐已經很氣惱；但是，大家最恐懼的是，菜已經發臭和有異物／蛆蟲。H 公司的員工傳了一張發霉的午餐照片給我們（圖 3），似乎司空見慣，雖然她們的午餐費用是 29,000 越盾／份，品質依然堪慮。K 公司的阿國說公司廚房裡老鼠、蒼蠅很多；F 公司的阿賢則說午餐不乾淨、

18 Suất cơm công nghiệp 12.000 đồng: Công nhân ăn gì? (12,000 越南盾的工業餐：工人吃什麼?)，Pháp Luật，2017 年 9 月 12 日，<https://plo.vn/suat-com-cong-nghiep-12000-dong-cong-nhan-an-gi-post452683.html>，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19 Bữa ăn công nhân: Đã ít còn bị xì xèo (午餐已經很少，還被折扣)，Lao Động，2012 年 10 月 2 日，<https://laodong.vn/archived/bua-an-cong-nhan-da-it-con-bi-xa-xeo-705429.ldo>，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菜有蟲，很髒；B 公司的阿翠認為公司的飯菜不好吃，承包商送來的午餐已經冷掉了，很重的魚腥味，甚至惡臭，還有菜裡有異物像是蒼蠅、蛆蟲、頭髮，米飯乾、硬等等。午餐中毒事件也不少見，位於平陽省的台資遠東紡織（Apparel Far Eastern Vietnam），2016 年 2 號廠曾發生 1,500 多名工人在食用公司食堂的集體午餐後（27,000 越盾／份），多人昏倒，被送往醫院搶救。當被問及公司工作餐時，工人提及公司的工作餐是外包的，工作餐無論新不新鮮，工人都必須吃才能有力氣工作。²⁰ 台資 All Wells International 2012 年發生過蛆蟲事件，工人在食堂吃午餐時，突然把筷子扔到桌上，喊道：「天哪，有蛆蟲！」。眾人發現魚丸裡有許多小蛆爬來爬去，很多工人當場嘔吐。²¹



圖 3 台資 H 公司的發霉午餐

圖片來源：H 公司員工提供。

20 Bữa cơm công nhân và nỗi lo ngộ độc thực phẩm（勞工一餐和食物中毒的擔憂），vietnammoi，2016 年 11 月 7 日，<https://vietnammoi.vn/bua-com-cong-nhan-va-noi-lo-ngo-doc-thuc-pham-9277.htm>，取用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21 Ăn cơm có dòi, nhiều người bị nôn（吃米飯有蛆，很多人嘔吐），Người Lao Động，2012 年 6 月 1 日，<https://nld.com.vn/thoi-su-trong-nuoc/an-com-co-doi--nhiều-người-bi-nôn-20120531100652146.htm>，取用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二）台商的供餐原則：「吃得飽」的強制共餐

工人對午餐難吃的抱怨，其實還夾雜著對強制共餐的不滿，時間始終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工人用餐的標準流程，必須在 30-60 分鐘內完成排隊取餐與進食。取餐隊伍擠滿了人，員工較多的公司會在地板上劃出排隊動線，一般說來，要排隊 10 分鐘以上才能領到午餐。以午餐平均用餐人數 8,000 人的 D 公司來看，公司有兩個食堂，分批用餐的區隔時間是 10-15 分鐘，食堂人滿為患。台資 K 公司的工人提到，公司只給 30 分鐘吃飯休息，人多，餐廳不夠大，廚房打菜人手不足，排隊時間越拉越長，通常要 10 分鐘以上，吃完飯就沒有休息時間，於是會有人插隊，甚至打架。午餐飯菜難吃、用餐環境炎熱、時間緊湊，卻也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多數台資廠午餐時間是不能自由外出，午餐時間短暫也限制了工人外食的可能性，怕時間不夠，來不及上班。有的公司不允許帶食物到公司吃，需要營養的孕婦們只能偷帶食物。²² 另外，我們研究的台資除了 H 公司外，其他 10 家，即使不吃午餐也不會補餐費給工人，用這種方法來強迫工人吃工作餐。以我們訪談的西寧 T 工業區來看，此區是基本薪資屬於第二區，工人的月薪收入來自基本薪資、加班費和津貼，平均大約是 700 萬越盾，如果以午餐 3 萬越盾來計算，如果不吃公司的午餐，每月便會花掉 78 萬（約 11%）左右的薪資，這對工人階級來說是很大的負擔。根據國家營養研究所調查胡志明市工人的膳食情況，發現工人只敢將 27.3% 的收入用於飲食，大約 20% 的工人每天只吃兩餐，其中不吃早餐的比例最高。²³ 這樣看來，工人在公司的午餐，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餐，更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來源。

那台商是如何看待工人午餐和因應工人對午餐的不滿呢？「天下

22 Com công nhân, vì sao khó nuốt? (工人的飯，為什麼難以吞嚥?)，Công lý, 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s://congly.vn/com-cong-nhan-vi-sao-kho-nuot-87733.html>，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

23 "Sốc" với bữa ăn sáng của công nhân tại các KCX- KCN (出口加工區工人「震驚」的早餐)，Người Lao Động, 2019 年 7 月 29 日，<https://nld.com.vn/cong-doan/soc-voi-bua-an-sang-cua-cong-nhan-tai-cac-kcx-kcn-20190729095321103.htm>，取用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沒有白吃的午餐」，台商提供午餐的目的是基於汲取工人的勞動力，在購買的勞動時間內極大化生產力，為了解決工人對午餐的抱怨，C 公司每週六上午固定召開伙食會議，會議上有各部門的員工代表，工團主席以及廚房人員針對一週的午餐菜色提出商討，經由各部門代表瞭解員工對該週午餐的想法，立即對下一週的菜色做出調整。I 公司的午餐政策，每個星期會有一張關於午餐的建議報表，傳給生產線的每個組長，讓組長去詢問工人的意見，工團再找午餐外包廠商談改善。此外，工團的幹部必須要和工人一同吃飯，工人有問題可以直接向工團表達。員工千人以上的企業，²⁴ 會以更系統化的防範爭議方式來供應工作餐，如 A 公司和 D 公司設置午餐樣品櫃，讓員工先行選擇，以節省時間。D 公司、F 公司和 K 公司，事先公布一星期的菜單，每日午餐前一小時由總務或衛生人員進行試吃、拍照以及保存午餐樣本等，以監控午餐的品質。H 公司的伙食委員會每月先行試菜，同意後才出菜，每年辦理外包商評鑑。儘管如此，工人對午餐的抱怨仍然不間斷，有的台商就會認為這是「藉機鬧事」；所以，台商提供午餐的基本原則是工人吃飽和不能發生食物中毒，並以「免費」供餐而非午餐津貼方式，強制工人在公司食堂共餐。對資方來說，午餐好不好吃不是重點，G 公司台幹李先生提到：

你上班重點是吃飽而已啊！上班只有吃飽而已，大部分喔，公司不要太誇張，肉之類不要有味道，是臭的味道。原則上，第一個，飯要夠飽；另一個，不要給他排隊太久。公司只有吃飽而已！那你要吃好吃的，回家煮啊！……對勞工來說，在工廠吃飽沒有問題，我會去監督，在品質、溫度、數量、衛生都弄到好。我是覺得吃飽是沒有問題啦！

24 根據越南罷工調查結果顯示，公司規模越大，工人罷工的可能性就越大。依企業員工數大致可以分成四類：1-99 人、100-249 人、250-999 人、1000 人以上，罷工率分別為 6.40%、19.90%、29.80%、40.20%。千人以上的企業罷工率較高的原因，可能來自工人認為這些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因此更有可能支持基於工資或福利要求的罷工（Anner 2018）。

D 公司主管則說：

不好吃，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因應的方案。除非員工他反映，那個飯吃不夠、那個菜打少了！他吃的菜有看到頭髮啊！還有異物的！他投訴，我們就懲處，跟廠商開罰單！

資方最重要的殺手鐮是，不吃就餓肚子的「零合策略」，因為午餐對資方來說是一種消耗性福利，而不是必要的基本權利；資方認為「免費」午餐即使不好吃，勞工也必定會「加減吃」來維持體力。D 公司主管提到，如果員工沒有吃午餐，公司也不會補貼任何東西，「所以工人會乖乖的在公司吃飯」；G 公司的員工曾要求補 24,000 的餐費，讓他們自己去買，李先生的回答是「怎麼可能？」，為什麼不可能？一定要強制共餐呢？我們得到的一些答案是，會造成小販聚集、閒雜人等在公司出入、髒亂、老鼠來咬電線、吃飯 1 小時前就在那訂便當。更重要的理由是，許多工人為了省下食物津貼，會隨便吃，例如只吃一根玉米，有人就在工作時昏倒。一名玻璃廠的台商便說有工人為了省午餐錢，沒吃飽飯，下午搬玻璃搖搖晃晃，看了膽顫心驚。另外，也有台商提到，如果給錢，要給多少？這也會是另一個抗爭的引爆點，越南的物價波動高，計價的基準在哪？基本上，資方所在意的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只要能守住量能吃飽／維生的這個底線；雖然很像馬克思說的，給工人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但台資認為在法規上與道德上都是沒問題的。越南國家營養研究所建議，工作餐應占男性工人每日能量貢獻率的 35%，占女性工人的 32%，對重體力勞動群體則應佔 39%，²⁵ 為防止工人拿津貼卻不自己帶餐，沒吃飯沒體力工作，免費的強制共餐是台商普遍的解決方法。

25 Bữa ăn ca của công nhân chưa được coi trọng (工人的輪班餐沒有得到重視)，Nhân Dân, 2012 年 9 月 17 日，<https://nhandan.vn/bua-an-ca-cua-cong-nhan-chua-duoc-coi-trong-post390912.html>，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另一項理由是，集體共餐較能控制工人的時間，因為時間就是金錢。基本上，台資也知道強制共餐的方式並不讓人滿意，但在資本主義下商品化的勞資關係，資方通常將工人的「午休時間」視為工人仍受雇主支配的「工作時間」，所以怎麼吃和吃什麼也應受資方強制管理。台資清祿的女工就曾向媒體抱怨，許多工人想自掏腰包出去吃飯或自己帶飯到公司吃，但公司不允許，²⁶ 台資華豐的工人也指出，午餐時公司不讓工人外出用餐，強迫工人在擁擠的食堂吃飯，²⁷ 這樣強制工人集體共餐，是華豐 2005 年大罷工的原因之一。在當代越南勞力密集在台資工廠中，多數是以專制式的勞動控制手段來取得工人的從屬性，以便在購買的勞動時間內增加勞動強度或勞動消耗，汲取一定時間內的較大勞動量。安排 30-60 分鐘內的集體共餐，主要目的之一即是節省時間和控制勞動力，能更精確地掌控工人的勞動時間，確保工人每日投入生產過程的勞動量。

以上兩個理由，都涉及了工廠體制的政治美學，台資工廠治理的特徵很類似極端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t）的意識形態（Scott 1998）與傅柯討論的工廠體制的控制形式，傾向以簡單化與清晰化的視覺美學來安排工廠紀律，以威權的方式將複雜簡化為秩序的規訓。集體共餐簡單化了工人口味差異的生理需求與用餐時間，同時也能清晰的看見工人在食堂中確實用餐，能維持體力保持效能。在工廠體制中，我們看到的是資方將工人的勞動狀態，以及作為人的社會需求（進食、上廁所、睡眠）都納入可控的範圍和工廠建構的秩序之中。

四、越南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餐供應政治

在越南與工人權益相關的「準」政府部門是「越南總工會」，總

26 Bữa cơm công nhân còn nhiều nỗi lo (工人的餐食還有許多憂慮)，Longan，2018 年 3 月 27 日，<https://baolongan.vn/bua-com-cong-nhan-con-nhiu-noi-lo-a53292.html>，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27 Vì sao công nhân nổi giận? (為什麼工人們生氣了?)，Tuổi Trẻ，2005 年 6 月 6 日，<https://tuoitre.vn/vi-sao-cong-nhan-noi-gian-82216.htm>，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工會及其下屬工會是唯一合法代表工人階級的工會，在共產黨領導的議程下運作。基本上，越南總工會是遵循列寧主義的雙重功能工會模式，工會既鼓勵發展生產力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力功能），同時也保護工人不受管理階層的剝削（Anner 2017）。基本上，越南社會主義政府對勞動力再生產的調節，一方面是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另一方面則是規範以勞動單位為基礎的集體消費／共餐。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正如 2017 年當時的越南總理阮春福在與總工會主席團開會時，曾指出工人的最低工資仍然很低，他們不得不依靠中午的集體用餐來再生產勞動力。²⁸ 越南最低工資的制定是為維持工人基本生活所需，但卻遠低於其他東協國家，2022 年外資的最低工資約為 192 美元，國內企業（國營、私營）2018 年時的最低工資約為 61 美元，低於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柬埔寨。²⁹ 最低工資往往也是外資工廠勞資爭議的引爆點，為什麼外資的最低工資訂這麼低呢？阮春福曾表示，最低工資的實施路線圖必須和諧、體貼達理，「因為最低工資太高，招商引資困難，解決不了許多工人的工作問題；太低，工人的生活就會很艱難」。³⁰ 越南政府計畫逐步將外資與國內企業的最低工資調成一樣，但因為國內最低工資涉及的還包括所有政府部門雇員及社會福利支出的預算，影響甚大。政府無法提高外資的最低工資，即是因為肩負著提供友好投資環境和改善勞動條件的敏感任務，於是必須尋找其他措施來改善勞動條件，同時推遲對最低工資的調整（Do et al. 2006）。規範以勞動單位為基礎的集體共餐，便是這樣的

28 Giai cấp công nhân đã đóng góp quan trọng vào sự phát triển của đất nước (工人階級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Hànộimới, 2017 年 6 月 29 日，<https://hanoimoi.com.vn/tin-tuc/Chinh-tri/872201/giai-cap-cong-nhan-da-dong-gop-quan-trong-vao-su-phat-trien-cua-dat-nuoc>，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29 〈越南與東協各國最低工資比較〉，越南財經新聞，2022 年 4 月 20 日，<https://vneconnews.com/%E8%B6%8A%E5%8D%97%E8%88%87%E6%9D%B1%E5%8D%94%E5%90%84%E5%9C%8B%E6%9C%80%E4%BD%8E%E5%B7%A5%E8%B3%87%E6%AF%94%E8%BC%83/>，取用日期：2023 年 7 月 30 日。

30 BÀI 2: CÔNG ĐOÀN VÀ SỨ MỆNH ĐẦU TRANH CHO TIẾN BỘ (第 2 課：工會使命為進步而奮鬥)，2021 年 4 月 27 日，HỌC VIỆN AN NINH NHÂN DÂN，<https://hvannd.edu.vn/bv/ct/3729/bai-2-cong-doan-va-su-menh-dau-tranh-cho-tien-bo-tiep-theo-va-het>，取用日期：2022 年 6 月 16 日。

措施。

2007-2011 年間越南通貨膨脹，當時許多工廠沒有供應工作餐，或只補助不足以維生的午餐津貼，低工資和高通膨，讓工人因營養不良／饑餓而住院的報導不時傳出，工人也不斷地控訴食物不夠吃（Sui and Chan 2015: 81）。2011 年寶成 9 萬名工人大罷工，即包括工作餐的議題，當年越南勞動部（The Ministry of Labor, Wa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airs, MOLISA）已意識到工作餐對工人勞動再生產的重要性，要求地方政府檢查並要求企業保證工廠食堂的食物質量符合標準。勞動部同時發布一項研究文獻，建議修訂勞動法，強制外資工作餐的最低成本是每人每餐 15,000 越南盾（Chan and Siu 2016）。這些措施開啟了越南政府改革開放後的工作餐供應政治，以滿足工人維生的基本需求；但是，一直要到 2016 年才有關於工作餐的 7c/NQ-BCH 號「工人工作餐品質」決議，³¹ 這是越南政府執行其保護工人職能的新嘗試，可說是在不損害其植根於社會主義正當性的威權統治下適應資本主義轉型的一種策略。但是此決議並非法律而是總工會頒布的工團條例，³² 主要是透過規範基層工會來進行勞資集體協議，集體協議的原則是勞資雙方自治、協約自治的行動。越南《勞動法》所規定的是勞動條件的最低基準，集體協議則是被定位為自主地維持、改善勞動條件之機制。工作餐的品質於是取決於工人和僱主之間的談判協議，例如，韓資 Hansae 公司工會主席 Võ Văn Hùng 表示，「只要基層工團好好協商，加上業者對工人有憐憫之心，午餐的品質一定可以改善」。³³ 這句話的重點是「業者對工人有憐憫之心」，也就是說工人午餐的品質很大一部分是要依賴資方的善意，而大多數的資方在集

31 NGHỊ QUYẾT(決議)，THƯ VIỆN PHÁP LUẬT，2016 年 2 月 25 日，<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Lao-dong-Tien-luong/Nghi-quyet-07c-NQ-BCH-chat-luong-bua-ca-cua-nguoi-lao-dong-2016-304367.aspx>，取用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32 有關越南總工會的工團條例（Statutes of Viet 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 Charter of Vietnamese Trade Union）規定，並非法律而是越南總工會的內部規範，但因越南採取單一工會制度，因此全國各工會依法必須遵守工團條例（徐遵慈 2016）。

33 Lo cho công nhân（照顧勞工），Người Lao Động，2015 年 12 月 31 日，<https://nld.com.vn/cong-doan/lo-cho-cong-nhan-20151231215010323.htm>，取用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體協議膳食計畫時，通常以 7c/NQ-BCH 號決議的水準為基礎。

7c/NQ-BCH 號決議在形式上，並不採取國家干預主義的方式來調解勞資爭議，而是希望透過更分權和民主的勞資集體協議方式來規制市場關係。在實質上，越南政府是以工廠集體共餐作為補償低工資的手段，一方面向工人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按照工人的利益行事，賦予工人協議工作餐的權利，維持社會主義保護工人的意識形態承諾。另一方面讓外資相信，工人的要求到此為止，不會有更激烈反市場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是卻將解決勞資爭議的壓力轉移到資方手上。依據決議文，工人午餐抗爭的正當性受到越南社會主義政府「受限的」保護性干涉手段的支持（不像薪資、工時等明訂於勞動法中）。越南工人對工作餐的抗爭似乎逆生出一些政治空間，即經由每日例行午餐，工人可以進行持久和難以消停的日常抵抗，開闢出協議的空間。為了讓工人明白工作餐勞資集體協議的重要性，工會也透過各種政治宣傳讓工人認知自身的權益。以越南目前的勞資關係來看，相較於少數以強大工會力量與資方進行集體協議的企業，大多數企業中是工人自身對集體協議的認知與近用，才讓集體協議在勞資關係中發揮普遍性的作用。根據 Chan（2011）的研究，越南工人對集體協議的認知明顯高於中國的工人階級。

政治宣傳（propaganda）對越南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並不是一個帶有貶抑意涵的詞彙，向來便是動員群眾的重要手段。在 7c/NQ-BCH 號決議中，便提到工會：

要提高工人和雇主認識營養、食品衛生安全以及工作餐品質對工人健康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和作用，加強媒體宣傳膳食質量的意義和效果。組織宣傳形式，如發放傳單、小冊子、企業訊息網頁、巡迴諮詢活動、座談會……並且重點關注工業區和勞力密集的企業。表彰做好營養保障、食品安全和員工膳食品質等工作的企業。同時，各級工會建議有關部門對違反食品安全規定的企業應嚴肅處理。

於是，透過各級工會大力宣傳，我們可以在各電子／媒體、臉書專頁、社交媒體 Zalo 群組（類似 LINE 群組）上看到有關工作餐的訊息，例如，上傳優質午餐照片，分享工作餐集體協議內容等。有關工作餐政治宣傳的內容，一方面，政府積極地正面表彰工會爭取到供應高質量午餐的外資企業，例如，勞動報就多次報導韓資泰光的優質午餐，前總理阮春福 2016 年後也曾兩度到僱用 37,000 名工人的泰光與工人一同排隊取餐和進餐，³⁴ 高度讚揚泰光工會努力協議出 23,000 越盾／份的工作餐，能保證工人的健康與勞動力再生產。在越南總工會的電子雜誌上和各工業區的臉書粉絲專頁上，³⁵ 可以看到工人上傳各自公司的午餐讓大家評比，上面也有許多爆讚的午餐（如：Panasonic, Canon, Colgate）。另一方面，總工會也會負面地宣傳外資與工作餐承包商供應質量不佳的午餐，所導致的罷工、抗議與中毒事件。有時媒體也會指責外資對工人工作餐的苛刻，台商抱怨，越南媒體常報導台資的工資低，伙食差。透過大量的政治宣傳及倡議，工人知道，質量均衡的工作餐是工人基本權利的一部分，也是資方應盡的義務。在勞動大會中，工人可以代表自己，替自己發聲；例如，前文提到的台資 C 公司，定期召開勞動大會，與會者包括公司管理階層代表、工會主席、工會代表以及由各部門所推派出的工人代表們，工人的發言許多是針對工作餐的建議，如：增加酸湯的次數、供應素食、口蹄疫期間不吃豬肉、禽流感期間不吃雞鴨肉、不要煮冷凍魚和鹹蒸蛋、每週二要煮酸湯、加班時也要每星期煮一次酸湯等等，工人並且要求必須將這些建議寫進集體協議中，顯示工人理解集體協議的重要性。

基本上，越南政府／總工會與台資對於以集體共餐來供應工作

34 Thủ tướng ăn cơm tập thể cùng hàng trăm công nhân (總理與數百名工人一起集體用餐)，Pháp Luật，2017 年 10 月 28 日，<https://plo.vn/thu-tuong-an-com-tap-the-cung-hang-tram-cong-nhan-post459340.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

35 Cơm công nhân có gì? (工人吃什麼飯?)，Lao Động và Công Đoàn，2021 年 3 月 8 日，<https://laodongcongdan.vn/com-cong-nhan-co-gi-67927.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7 月 1 日。

餐，看法一致。雙方都認為工作餐的主要目的是為勞動力的再生產，以總工會立場來看，資方應供應安全營養的團膳來維持工人勞動力的再生產，而且最好是以自組集體廚房而非外包的方式來供應，以保障食物的安全。為突顯工會保護工人的功能，落實集體共餐機制，總工會要求各級工會將工作餐協商視為經常性任務。以成果來看，2022年時簽訂了21,457份包含工作餐內容的集體協議，占已簽訂集體協議總數的57.07%，其中94.03%的集體協議餐費在1,5000越盾以上。³⁶ 2022年1月18日，越南總工會決議繼續執行7c/NQ-BCH號決議，以集體協議方式提高工人膳食質量作為照顧工人生活和打造 (xây dựng) 工人階級的重要方案。雖然，越南政府與總工會認為對話式的集體協議是解決勞動再生產以及工作餐爭議的有效方式，但是，仍有將近一半的集體協議內容並未包括工作餐，19.44%成立基層工會的企業，沒有為工人提供工作餐，大約有29.57%的工人沒有得到工作餐的支助。³⁷ 食物中毒、因午餐而集體停工等情況時有發生，有關工作餐的罷工與抗爭仍持續存在。

五、吃得好：越南工人階級的午餐抗爭

越南台商常說工人的午餐比在家裡吃的好多了，給的薪資也比越南本土企業高，哪有剝削的問題？工人則表示不期待豪華可口的午餐，只希望吃得好。如前文所述，越南台資公司的工作餐抗爭事件曾登上媒體，在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下面的議題，工人對工作餐的抗爭到底是抗爭什麼？又反映了什麼樣的勞資關係？我們要如何從中理解越南工人的權利意識以及其反叛性行動主義的政治性？

36 同註22。Com công nhân, vì sao khó nuốt? (工人的飯，為什麼難以吞嚥?)

37 CÔNG ĐOÀN THƯƠNG LƯỢNG GIÁ TRỊ BỮA ĂN CA THẤP NHẤT LÀ 18.000 ĐỒNG/SUẤT (工會談判最低工作餐價值為18,000越南盾/份)，Lao Động và Công Đoàn, 2022年2月28日，<https://antoanlaodonghd.com/gia-tri-bua-an-ca-thap-nhat-la-18000-dongsuat>，取用日期：2022年6月22日。2022年總工會建議在集體協議時工作餐餐費依最低薪資地區差異，以18,000越盾(第3與4區)及20,000越盾(第1與2區)作為談判的基礎。

(一) 工人午餐抗爭的形式與內容

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爭，有時只針對工作餐，但多數的抗爭是結合了其他的訴求。通常劣質的工作餐與嚴苛的勞動條件是共變的，多數台資工廠的工資是跟著最低工資，不會少付但也不會多給，以 2020 年越南第 1 區（核心工業區）最低工資 442 萬越盾（194 美元）來看，研究報告指出與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相比，這個數字低了 41%。³⁸ 以同為 NIKE 重要代工廠的台資寶成與韓資泰光比較，2019 年寶成的國際集團執行長蔡佩君指出，寶成工人每月的平均收入是 300 美元（710 萬越盾），並宣稱越南已經沒有便宜工資了；³⁹ 而韓資泰光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則超過 387 美元（920 萬越盾），比寶成多了將近 30% 左右。⁴⁰ 平陽省聚集了全越南約三分之二（1,600 多家）台資，平陽台商會名譽會長劉政諺估計，只給最低薪資或刻薄工人的台商，超過 50%。⁴¹ 2018 年我們到同奈仁澤三工業區進行研究，當時韓資新進工人的月薪是 700 多萬越盾，台資是 540 萬。在工時上，台資廠每週加班 30 小時，每月加班 100-130 小時的工廠並非特例，完全不可能符合勞動法每月加班時數不超過 40 小時的規定；而韓資和日資在星期六不上班，台資通常要上班。另外，台資的勞動控制有專制化傾向，上班遲到、上廁所超過 5 分鐘、打哈欠、工作失誤……都要罰款。罷工領導者通常會被秋後算帳開除，有些台商表示寧願認賠關廠也不願和罷工者妥協。台資抵制罷工的強烈手段，如 2010 年機車零件廠 Giai Duc 的保全開車衝撞罷工者，造成 1 死 6 傷的公安事件，保全事後提及事發當時，他接到公司行政組織部主任的電話，要求不

38 “Vietnam unable to match minimum wages with living standards”, VnExpress, 2022 年 3 月 21 日, <https://e.vnexpress.net/news/economy/vietnam-unable-to-match-minimum-wages-with-living-standards-4441616.html>, 取用日期: 2023 年 7 月 28 日。

39 〈寶成蔡佩君示警：越南已無便宜工資了〉，財經新報，2019 年 6 月 17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9/06/17/pouchen-vietnam-pay/>, 取用日期: 2023 年 7 月 15 日。

40 Bí thư chi bộ luôn nỗ lực vì người lao động (支部書記一直為員工而努力), Báo Đồng Nai điện tử, 2020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baodongnai.com.vn/chinhtri/202002/bi-thu-chi-bo-luon-no-luc-vi-nguoi-lao-dong-2987336/>, 取用日期: 2022 年 7 月 1 日。

41 〈與越南虎共處〉，《商業周刊》第 1384 期，2014 年 5 月,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MagindexContent?issueNumber=1384>, 取用日期: 2023 年 8 月 12 日。

惜一切代價將車開進公司。⁴²2000年華豐工人因強制共餐與宿舍的管理政策罷工，公司驅逐12名到人民委員會提交請願書的罷工者，禁止她們回工廠和宿舍，導致這些來自外地的移工無處可歸，流落街頭數日，在大太陽下展開絕食抗爭，有7名工人因饑餓和高溫而昏迷。但華豐管理階層拒絕協助送醫，一名人事經理堅稱，絕食抗爭者的健康情況與公司無關，「這些工人已經被解僱，所以她們不再是公司員工」。⁴³

上述兩起台資工廠的罷工都出現改善工作餐的訴求，工人的午餐抗爭似乎與資方的管理專制化傾向共變，以下本文再進一步以「已在媒體上消耗了大量墨水和紙張的華豐工人抗爭歷史」⁴⁴來說明工作餐所反映的勞資關係，以及工人的抗爭行動。本文作者之一曾在2001年訪談過越南華豐的管理階層，華豐是恆豐集團轄下的公司，是一間「人頭公司」，由越南華人佔名。因為註冊為越南民族資本，可以獲得各種稅率上的優惠，而對工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薪資是按遠低於外資的本地薪資支付。除了薪資低以外，華豐的勞資爭議還包括，強迫加班、強迫住宿、嚴格管控上廁所、不當體罰以及劣質的工作餐等。在媒體上出現過的報導包括，1997年9月，台幹 Liu Tien Kuang 強制120名工人在烈日下受罰1小時，引發全廠罷工。2000年9月時，2,500名工人反對強制共餐與住宿的管理政策，並有12名工人進行絕食抗爭。2005年，數千名工人罷工，並憤怒地砸爛公司食堂和辦公室。2006年2月，工人罷工，要求比照外資的最低薪資。2007年，社保機構表示，公司積欠社會保險金高達52億越盾。2008年3月中

42 Hà Nội: Tạm giữ lái xe đâm chết nữ công nhân đình công (河內：拘留撞死罷工女工的司機)，Giáo dục Việt Nam，2011年6月23日，<https://giaoduc.net.vn/ha-noi-tam-giu-lai-xe-dam-chet-nu-cong-nhan-dinh-cong-post5498.gd>，取用日期：2023年7月28日。

43 Workers' tragedy in Vietnam: Strike at the Hue Phong shoe factory in Ho Chi Minh City, Marxism.com，2005年6月13日，<https://www.marxist.com/vietnam-workers-tragedy231000.htm>，取用日期：2023年7月28日。

44 青春報記者對華豐勞資關係的描繪。Đình công tại công ty Huế Phong (TP.HCM): Cần can thiệp mạnh! (華豐公司罷工：需要強有力的干預!) Tuổi Trẻ，2008年4月26日，<https://tuoitre.vn/dinh-cong-tai-cong-ty-hue-phong-tphcm-can-can-thiep-manh-252763.htm>，取用日期：2022年8月15日。

旬，4,000 名工人罷工，依然是抗議低薪和劣質工作餐……⁴⁵ 這場罷工起因於之前華豐曾承諾工人提高薪資以及工作餐品質，但均未實現，工人表示一份 3,000 多越盾的工作餐，在物價飛漲的時代，怎麼可能「吞」的下去。⁴⁶ 這次罷工更是越南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最長的一次罷工，長達 25 天，是華豐 1992 年在越南成立 16 年以來因集體勞資爭議而導致的一系列罷工之一。經過 10 多年的抗爭，2008 年華豐的最低工資提高到接近外資的水準，當時外資第一區的最低工資是 165 萬越盾，華豐則是 155 萬越盾（Trần 2013: 254）。

華豐資方對勞資關係與工人罷工的看法又是如何呢？2001 年訪談華豐時，工廠有 5,000 多名工人，95% 是女性。有關勞資關係與工人罷工，一名受訪的管理者提到越南工人普遍有民主思想，崇尚自由，而且整個社會對工人十分保護，他感到非常的意外。罷工時，數千名工人就在工廠內「排山倒海呼呼的叫，我第一次碰到那麼大的場面」，這是他在台灣和中國未曾見過的事。我們問工人為什麼罷工，受訪者輕描淡寫的說：

簡直是平常性。平常性日常性事情啦，這個不公平啦、那個不合理啦，就這些事情。……像我們這裡伙食團，你吃飯睡覺以及生活上的……你的菜不好啦，或者你的宿舍有老鼠啦、有蚊蟲啦這些問題，就是這些生活上的瑣碎問題。在現場有一個幹部罵了她啦，還是怎麼樣，就是這些事情，其他沒有什麼大事情，就是她不平則鳴。

受訪者憤憤地表示，在當時越南「這個國度裡談人權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一種奢侈」，因為國民所得 370 美元的國家，要求國民所

45 Hàng nghìn công nhân đình công nhiều ngày (上千工人罷工多日)，Dân trí，2008 年 3 月 17 日，<https://dantri.com.vn/xa-hoi/hang-nghin-cong-nhan-dinh-cong-nhieu-ngay-1205900059.htm>，取用日期：2022 年 9 月 7 日。

46 同註 44，Đình công tại công ty Huế Phong (TP.HCM): Cần can thiệp mạnh! (華豐公司罷工：需要強有力的干預！)

得一萬多美元國家的人權，不合理。資方對工人階級日常生活需求的道德貶抑，應該是造成勞資雙方對立的原因之一。

2000 年以後，華豐發生的多次罷工，規模多達數千人，除進行長時間罷工外，工人還會激烈地砸毀公司財產。根據青春報的報導，2005 年 6 月 3 日，華豐的數千名工人同時拒吃，再次進行激烈的粉碎抗爭，砸爛了 7,000 份左右的工作餐、食堂內的冰箱、收銀機、電視、電腦、飲料、桌椅，同時也砸了工廠的醫療室、倉儲室並摧毀了 2 條生產線。當局花了將近四個小時才恢復秩序，估計經濟損失約 40 億越盾。工人提及：

公司只關心致富，殘酷地剝削勞動力。公司經常加班，每人每天至少工作 12 個小時，週日還不允許放假。即使是午休時間，也不允許工人躺下，只能坐著睡覺，頭只能靠在桌上。……外國專家的態度非常粗魯，詛咒甚至毆打工人的頭部。……中午不能出去吃飯，至於中午吃的飯，生的、乾的、壞的，近萬名工人只有一個食堂，吃飯的時候，要想吃得好，就得擠來擠去。甚至互相打架……。⁴⁷

再以本文受訪的台資公司來看，大致上也可以推論出工人的午餐抗爭與勞動條件之間的相關性。台資 B 和 C，兩家企業提供的餐費差不多，大約 2 萬和 2.2 萬，員工人數也類似；但是兩家企業的工人對工作餐有相當不同的態度。相較於台資 B 來說，台資 C 的員工對工作餐的負面意見較少，接受調查的 10 位工人，大都滿意公司提供的午餐，只有 2 位希望能夠以食物津貼來取代集體共餐。而台資 B 工人對午餐的抱怨比較多，受訪的 10 位工人中有 8 位希望能以食物津貼來取代集體共餐；工人提了很多意見，公司也換過午餐承包商，但

47 Giải quyết vụ đình công, đập phá tại công ty Huế Phong (解決華豐公司的罷工和破壞)，SÀI GÒN online，2005 年 6 月 4 日，<https://www.sggp.org.vn/giai-quyet-vu-dinh-cong-dap-pha-tai-cong-ty-hue-phong-47917.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

仍然沒有改善。這兩家企業的勞動控制方式不太相同，台資 C 的主要客戶是 NIKE，NIKE 會到工廠進行勞動／人權檢查，雖然檢查有時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台資 C 工廠會因此注重工人的聲音，比較落實勞資間的集體協議，工人在勞動大會上有關工作餐的提議，管理層大都會接受。台資 B 的勞動控制方式則傾向威權，例如，規定每天只能上 4 次廁所，上班時不能吃東西，曠工要罰一日薪資，還有記過等等；也缺乏勞資間的溝通，工人有關午餐的意見無法在公司內得到回覆或不尊重，便直接寫申訴信到地區工會「告」公司。

越南工人午餐抗爭的形式，除了上述對資方形成「間歇性」施壓的戰鬥性罷工外，更重要且更頻繁的則是日常的「持續性」施壓。工人的抗爭讓台商倍感壓力的，並不是高度戰鬥性的罷工，因為多數罷工是發生在 2005-2011 年間，且多數工廠在越南投資過程中，只經歷過一次的罷工，所以野貓罷工並不是台資工廠中的日常地景；而工人隱蔽式的抗爭似乎並非台商壓力的來源。主要的壓力來自台商所講的工人的「不平則鳴」，是一種讓管理階層時時處於緊張狀態，擔心工人將要罷工的壓力中，不知道哪天罷工就會到來。而這種抗爭是一種名符其實公開的日常抵抗，對資方持續施壓，這種日常抵抗通常是自發而非組織性的，經由信件、口語與肢體行動公開的表達不滿，寫投訴信、在食堂大聲的摔桌椅、拍桌子、午餐時向管理層舉起筷子後折斷，開會／勞動大會時長篇大論的侃侃而談要吃什麼，堅持要將菜單寫入集體協議之中，時而拒吃，如果不改善可能就發動罷工。這種公開的日常抵抗是工人渲洩不滿的重要機制，針對特定事件，而且通常能立即獲得改善，如午餐品質。而工人採取「持續性」的不平則鳴抗議形式，也是認知到取消集體共餐的不易，根本原因在於公司強調午餐是「免費」的，不可能換錢。而且，如果領午餐津貼，一般薪資是次月發放，工人必須自己先墊錢吃飯，如果工人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就要先借錢吃飯才能賺錢或不吃飯，對工人來說就會衍生問題。此外，許多台資將餐費壓到 15,000 越盾，連外面一碗 35,000 越盾的河粉都買不起，領這麼低的午餐津貼不見得更好。單身工人也覺得不方

便自己帶餐。因而工人午餐抗爭的訴求，通常是要求提高工作餐的質量，最具體的就是增加工作餐的餐費，其他的意見則包括更換工作餐承包商或是食物內容／口味的變化。工人對工作餐的態度，可以說是一種「批判性同意」（critical consent），接受集體共餐不是甘願的，是務實地認知到改變實際現狀的局限性，卻會持續抗爭。

午餐抗爭有時不純粹因為午餐而是其他目標的手段，如華豐高層所說的「藉機鬧事」、「不平則鳴」，經由意涵著道德力量的食物騷亂，來開闢異議各方集體協議的政治空間（政府、資方與工人）。台資 K 公司幹部提及：

鬧就是大部分鬧什麼？一定要有個起頭嘛！啊有人會講有的沒有的嘛！就鬧起來了！鬧起來的時候，你鬧薪水，薪水，公司解釋合理，又鬧伙食，伙食完後又鬧幹部，幹部什麼管理不當啊，之類的！再開始鬧什麼？廁所！加班太多！廁所太臭之類的，有的沒的！因為你從薪水開始，鬧到伙食，廁所，管理……。

又如供餐方式，台商擔心用餐時間會有工人先到把菜吃光光，於是以桌餐方式供餐，台商提及：「我們那裡的搭伙，都是六個人一桌，像軍中生活像成功嶺一樣，規定要大家一起坐好後，起立相互敬禮開動。但越南工人就有人會去打報告，說我們辛辛苦苦工作，吃頓飯還要跟中國人敬禮。」那以自助餐方式供餐呢？也一樣有人反彈：「越南工人認為來幫你工作你要供應飯，飯菜要分配好好的在桌上，不是讓人去要，他們覺得吃自助餐是去要飯來吃，是一種侮辱。」

對資方來說，越南工人根本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此外，工作餐是每日例行事務，這種持續「不平則鳴」的日常抵抗，即使是對工作餐的抱怨、諷刺和議論，而不是組織性集體的抗爭行動，但卻可以引發集體共識，創造工人的社會團結感，成為集體行動的潛在基礎。

工人午餐抗爭的內容，包括餐點品質、用餐環境、強制共餐和

種族差異的供餐等。其內容可以歸納成兩大類，一類是馬克思主義式抗爭，強調工人作為生產過程的勞動力，面臨著資本的經濟剝削，例如，屬於實質薪資的劣質午餐，造成勞動力再生產受到嚴重的威脅。台資廠工人提到公司提供工作餐，是為了讓工人獲得能量繼續工作，只關心工人吃飽的量，而非工人是否吃得下去。其次，是抗議資方竊取工人午休時間，越南勞動法第 109 條規定，若 1 日持續工作時間 6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最低是持續 30 分鐘。但是，工人午餐休息時間仍受到資方的控制與剝削，或午休 1 小時被「斬首斷尾」20 分鐘，被「吃」時間。例如，同奈工人的投訴中就明確的要求，「在午餐和休息時間強迫工人的任何工作都必須停止」（Nguyen 2018）。而根據公平勞動聯盟（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2015-17 年的調查，越南工廠違反工人工作餐和休息時間的比例達 41%，高於全球的 10%（Tung 2022）。馬克思主義式的午餐抗爭，相當程度來說，是為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物質需求，確保食物的充分攝取；以及奪回午餐、午休時間的權利。

另一類是博蘭尼式的反商品化抗爭，在這種抗爭中，階級成為有效的行動者，不只是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是為了個人尊嚴與捍衛社會的普遍價值。因此，抗爭的重點從剝削轉向商品化，從階級轉向社會。尤其是，當工人因出售勞動力而從屬於資本的支配時，作為承載勞動力的工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實體也經歷文化從屬化的過程；例如，越南工人必須面臨因為出賣勞動力而帶來的文化貶抑／低下化的不當對待，失去了自尊和品格。在食堂中，工人在面對外資供應的劣質午餐時，常將自身比喻為貓、豬、狗等動物，吃的是豬、貓、狗等牲畜而非人食用的食物。越南男人愛在工作前喝咖啡，則被資方道德貶抑為世上最沒用的人渣，整天只會喝咖啡。因而在午餐抗爭中的訴求除了階級面向外，還為了越南社會的普遍價值，除了爭取作為人類的得體午餐外，也要保護越南人的民族尊嚴，要求越南工人應公平地和外籍幹部吃一樣的午餐，無法看著台幹和陸幹吃著牛肉和大蝦，而一旁的工人只能吞下乾癟的午餐。

從表 1 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台資公司中，越南員工和外籍幹部是分開吃午餐；以 H 公司來看，共有三個食堂，其一是台籍幹部的招待所食堂，主要供應台菜，是自助餐式，自行取用，也有現煮的湯粉類和水果等，其次是越籍幹部和中國工作人員為主的第二與第三食堂，主要供應越菜和中國菜，供餐方式也是自助餐。幹部中午的用餐和休息時間是 90 分鐘，現場工作人員用餐時間是 30 分鐘，供應配好菜色的便當在工作現場用餐。雖然公司並未強制規定越籍員工不能到台幹的招待所食堂用餐，但食堂的分類原則已反映了階級與種族的差異。台資廠的越南員工大多知道外幹的餐廳和他們不一樣，F 公司的員工提到：

（外籍幹部）他們大概 50 個人左右，有另外的餐廳給他們吃。他們啊！自助菜啊！煮了很多，然後吃什麼去拿嘛！有粉，有飯，有麵！有肉，有菜！……煮最好的，我們也很想吃。

2007 年 C 公司成立初期，為了穩定外籍幹部（陸幹），保證提供 5-6 萬越盾菜色的工作餐，外幹每天午餐吃牛肉和大蝦，相對工人吃的是 13,000 越盾的乾冷午餐。面對階級與種族差異的供餐，便有 H 公司的越南員工不平的提到：「公司有客人來時，可以跟著去外國老闆的食堂吃飯，看著他們的飯菜，心酸越南人的食堂。他們提供自助餐，食物都是可口的，非常乾淨……想想就很難過！」

經過工人對不公平供餐的抗爭，有些公司採取新策略來化解午餐階級種族化而引發的義憤。2018 年時，C 公司台幹及陸幹會和越南工人一起在食堂吃 22,000 越盾／份的工作餐；只是，中國幹部的烹煮法會不同，比較油、比較鹹、比較辣，也會另外炒特製辣椒給中國員工食用。D 公司的作法也類似，公司約有台幹 100 多位、陸幹 20 多位，吃飯時是跟員工在食堂一起排隊吃午餐，但是有一個中餐窗口，工作餐單價和工人一樣。基本上，這是台商的一種「屈尊策略」，一

家輪胎廠的廠長提到為了表示公平，他會「下去」和工人一起吃午餐，但工人會在一旁偷瞄他是否將午餐吃完。G 公司台幹也和越南員工一起吃，沒有分開吃，以表明「我們（台幹）都能吃了，你為什麼不能吃？」A 公司台幹同樣在食堂和越南員工吃一樣的午餐，台幹通常是坐在第一排，有些幹部想增加與工人的親近性和表示公平性，會在越南工人群體裡一起用餐。K 公司的越籍員工提到，公司管理部跟總務為顯示平等會派一名主管「下來」和他們一起吃午餐，表示大家一致吃一樣的。I 公司會要求工團幹部和工人一起吃午餐，因為工人有意見比較敢向越籍的工團幹部反映。這些措施能立即知道當天工人對工作餐的態度，但是無法解決種族階級化供餐的問題。「屈尊策略」是支配者以一種暫時的，但卻大肆渲染的方式，放棄他的支配地位來和他的從屬者互動，透過拒絕這種支配關係而維持它的存在，以從中獲得地位的鞏固（Bourdieu 1982 / 褚思真、劉暉 2005）。「下去」和「下來」和越南員工一起吃午餐，顯示的正是以這種暫時性的放下身段，來獲得支配關係的維繫。

事實上，這種不同種族和階級成員在食堂中跨界（transgressing）共餐，通常是一種半隱蔽的隔離共餐。在種族階級化的社會中，社會成員的異質性和排斥性相伴而行，使得不同階級間的距離很難跨越，只是通過暫時和象徵性地共餐將區隔的群體聚集在一起，但最終仍確認和加強彼此的對立。雖然和工人共餐有著平等主義的外表，但是台商幹部們通常會比工人晚到食堂，而且大多數外籍幹部仍坐同一桌吃飯，繼續和同種族和階級的人互動，而工人則心存懷疑地在其他桌偷瞄幹部是否能和他們吃下同樣的午餐。所以，台商此種屈尊策略的跨界共餐，也是對階級界線的操弄，正是通過跨越界線來識別和維護它，很像政治領袖（阮春福）在工廠食堂與工人共進午餐，工人無法拒絕這種民粹主義儀式性的共餐，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補償，事物的秩序並未改變。如前文所述，台資的供餐是以能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吃得飽」為基本原則，有抗爭才有改善。

（二）越南工人團結的基礎：不被外人侵犯的共識

Trần (2013) 提到越南在改革開放後工人在面對外資時發生一系列的問題，而國籍 (nationality) 更成為重要的議題，工人的抗爭話語中會特別指出越南工人和非越南人外資間的對立，例如，「他們的財富是來自越南工人的血汗」。Trần 認為上述的文化認同可以作為工人團結的基礎。類似的，Nguyen (2018) 發現同奈省工業區工人寫給省級工會和地方政府的投訴信中，廣泛地出現外資公司的「種族差異」對工人造成的體力和精神壓力，傳達了一種工人共同的焦慮和沮喪感。工人指稱「中國人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奴隸或囚犯一樣」，韓國管理者經常對工人大喊大叫，而不是「交談」，工人認為這種行為是粗魯和輕蔑的。Nguyen 指出投訴工人提到「中國人」的角色值得進一步考慮，可能反映了歷史上越南長久受中國統治而產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怨恨；而提到種族差異的投訴信，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工人士氣低落和地位低下。Nguyen 的文章中並未明確地討論種族差異在塑造工人抵抗行動方面的作用，但認為投訴人在提及管理人員的種族身分時，是希望引發與她們有著相同公民身分紐帶之官員的同情。而在本文的研究中，也發現越南工人的民族主義認同除了可以團結廠內的工人外，也可以引發廠外民間與官方部門的支持。在以下的文章，我們試圖從越南台／外資工廠工人抗爭，去找尋越南立基於民族主義的反叛傳統，在涉外情境中如何成為團結的基礎。

在阮氏深的信中，她提到了「韓國專家」將襯衫扔到工人臉上的羞辱場景，這羞辱的不只是那名工人，而是所有在旁邊的越南工人。她於是問總工會主席鄧玉松：

請教先生，當韓國專家一直詛咒工人，甚至把襯衫扔到工人臉上時，您有什麼感受？我希望您站在我工人的立場來同情工人的命運，以越南總工會主席來評論越南公民的工作條件。（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在這裡，阮氏深一方面，利用「工人國家」社會主義理想的政治修辭，要求總工會對建立公平社會及親工人的理念負責。另一方面，也以越南公民的身分，召喚同為越南人的總工會主席的民族主義情感，考慮工人內心升起的窒息之痛，因為即使工人戰鬥、罷工，但勞動條件依舊沒有改變。於是，她在信末強調：

我和這裡的所有工人一樣，希望您明白，平等的權利，被尊重的權利，生命的權利正在被雇主踐踏，如果我們不鬥爭，那什麼才是正確的圖景，相信誰，靠誰？我會等待您的回覆，至少我一直為我是越南人而感到自豪，繼承了我們祖先的堅毅精神。

從阮氏深的信中，可以看到外資工廠工人的階級意識交織著民族主義，讓她遭遇苦難的對象是「外國資本」，反映的是「越南工人階級」的勞動情境。而在鄧玉松的回信中，也回應了工人國家的責任和民族情感的召喚；他提到自己 37 年前在南方是一名建築工人，也面臨過同樣的境遇和心情，正是這些顧慮和想法促使他在南方完全解放那天起，成為一名共產黨幹部。他強調越南人已成為自由國家的公民，要「富民強國」，不能接受「對勞動者的壓迫和剝削」。

一般說來，越南工人對國營事業的抗爭通常是微妙和含蓄的，對外資的抗爭則是「政治正確」的，外資才會被視為專制和剝削的資本。台商在訪談中，也常提到越南工人「民族意識太高」，他們常舉中國工人和越南工人比較，指出中國工人很怕被解雇，而越南人自尊心很強，寧可沒有工作也不要被糟蹋被罵，就算沒飯吃也不做了。有家西寧的台資工廠，有天陸幹拿鐵鎚和越南工人打到頭破血流，陸幹說越南工人敲他，越南工人說陸幹敲他，沒有人證，之後公安來做筆錄。公安來後，就直接寫「陸幹打越南工人」，台商說事實不是這樣，公安就明白說「打人，你就跑啊！跑去保衛那邊給他們處理，不然你們會吃虧。外人絕對不能動手。因為在越南的土地上，根本不會

有人出來當證人」。網路上有一段 9 分鐘左右的影片，⁴⁸ 2017 年韓國三星電子在北越的顯示器工廠，一名 40 多歲的越南工人被韓國保安從背後推倒，之後被拉進保安室毆打，憤怒的越南工人在短短的幾分鐘內迅速地從四面八方聚集了千人，隨即開始追打韓國保安。外資工人在社交媒體上號召罷工時，會寫「公司欺負我們越南工人」，也呼籲大家罷工時「記得帶國旗或是布條」。

我們訪談的台商大都認為越南人只會幫越南人，罷工時輿論也都是倒向工人，例如：

罷工向政府的勞動廳反映，他們會說，工人很可憐很貧窮，請多多體諒。而工團則是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場，開會協商時，通常會先指責資方不對，要資方先認錯，加薪，才擺平。

這種抗爭行動和社會回應比較屬於博蘭尼式跨越階級的反商品化抗爭，在越南這類抗爭通常是以民族主義來統合社會成員，例如，2016 年台塑河靜鋼廠因排放污水造成沿岸數百公里漁民受害的「魚之死」事件，越南社會是以反對主權／領土商品化的民族主義訴求，「如果我們（政府）沒有把海賣給人家」，促成越南社會跨階級的集體動員。同樣地，2018 年延長經濟特區租用年限至 99 年的《經濟特區法》，同樣遭到越南社會反主權／領土商品化之「愛國主義」集體抗爭，擔心越南成為外資（尤其是中國）的新殖民地，各地台資工廠的工人也以罷工「上街保國」方式響應，台資寶成旗下 4 個廠區、平陽永義鞋廠、隆安清祿鞋廠的工人都以罷工參與了此次跨階級抗爭。⁴⁹ 在外資工人的反商品化午餐抗爭中，也會以民族主義情感作為

48 〈韓國保安與當地工人爭執 三星越南工廠千人群毆〉，環球網，2017 年 3 月 2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0WGy>，取用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

49 〈越南反中示威又起，部分台商又被罷工〉，《天下雜誌》，2018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0471>，取用日期：2023 年 7 月 15 日。

訴求，來團結廠內工人與廠外的各類社會成員，包括地區工會、公安、媒體、他廠工人與一般大眾。例如，工人進行午餐抗爭時，會強調是有「外資」美譽的台資所供應的劣質午餐；或是抗議午餐不合理時，也同時抗議外籍管理者對越南工人的冒犯與謾罵。近年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向媒體投訴在外資工廠受到的不公平午餐／待遇，包括越南的重要媒體勞動報、勞動者報、青春報和青年報等；媒體大多是站在越南工人的立場來進行積極的報導，以支援工人的權益，新聞標題通常是「工人工作餐的擔憂」、「令越南工人難以下嚥的一餐」、「工人伙食太差」等等。而在內文也一定會揭露外資的國籍、名稱與廠址，如，100% 由台灣投資的 Yamani Dynasty Co., Ltd.、100% 台灣獨資的 Great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服裝公司。媒體除了將工人的投訴傳達給公眾外，也促成了相關政府機構和區級工會的介入。

階級不只是一種經濟形構，也是一種社會形構。改革開放後在形成越南工人階級的歷史過程中，階級經驗包括明顯種族分工的生產關係，以台資廠來看，台灣人與中國人是管理階級，被管理的是生產線的越南工人。每日的階級與種族差異的強制共餐經驗會讓工人體會到是階級種族化的共同體。而實際的午餐權利抗爭是交織在「工人團結一心」的階級認同與「堅毅精神」的民族認同之中，這也顯示了越南外資工人行動主義的在地特徵。在工人的階級認同中，工人認為「勞動資源應是企業寶貴的資本」、「工人的組合，企業才能獲利」，所以企業要關心工人的健康，照顧讓工人，提供質量高的午餐，讓工人安心工作。越南工人對勞動價值的肯定，除了前文討論的總工會系統的政治社會化效果外，部分原因可能來自歷史中越南人的南遷（Nam Tién）開荒（khản hoang）經驗。在南遷開荒的歷史脈絡中，底層人民從十一世紀開始便不斷地自北方向南方遷移找尋生存空間，開荒意指尚未被使用的土地，必須經由辛苦的勞動才能開闢出農地來，也就是說南遷底層人民近用土地的權利是根植於勞動力的付出，勞動力才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這樣的勞動價值觀曾為 1975 年後南方的集體化帶來巨大的影響，1976-1985 年間南方有兩波的土地改革，約

有 30% 的農戶被迫讓出土地進行再分配。當 1988 年越南政府開始推動第 10 號決議放寬土地使用權與生產的私有化後，之前被迫讓出土地的農戶開始了返還失去土地的抗爭，驅趕原先接受土地分配之農民，訴求的正當性正是來自於所有權與辛勤開荒、耕作勞動的連結（Gorman 2014）。而近代北方的越盟、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與南方第二共和阮文紹實施的「耕者有其田」，都是以勞動價值作為所有權的基礎，這樣的勞動意識也提供了工人抵抗外資分配不公的正當性。

在越南工人對外資的抗議中，能明顯地看到越南民族主義反叛精神的歷史遺緒。在越南歷史上，反叛向來不只是菁英傳統，也是大眾習俗。面對異族的威權，特別具有敵意，殖民時期的法國公共工程官員就曾說，越南人有驕傲與桀驁不馴的天性，你只要批評一名苦力一句話，所有其他人就會離開工地（Scott 1976 / 程立顯、劉建等譯 2001: 242）。而 1945 年以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過程中，將現實的戰爭結合歷史上的「北拒」／抗中事件，形塑出反殖民的民族歷史中心線。透過政治宣傳、街道命名、廟宇祭祀、塑像、教科書打造全民皆知的壯烈抗中女／民族英雄，而印度支那戰爭 30 年的熱戰，全越各地都被捲入其中，從北到南都存在抗法與抗美的反叛足跡。Kerkvliet（2010）也認為，越南戰爭期間的叛亂遺產可以解釋為什麼越南工人比中國工人更有可能參與罷工。「北拒」傳統結合當代冷戰時期最悲壯的印度支那熱戰，形塑出越南人不被外人侵犯的民族共識，以及自負是亞洲唯一戰勝過法國、美國和中國的民族。

六、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篇論文是從越南改革開放後外資工廠的午餐爭議出發，分析工廠午餐作為一種強制共餐，如何制度化於半邊陲的台資威權與階級種族化的勞動體制之中。強制共餐內涵著廉價外包的工業式午餐、壓縮／竊取用餐時間、階級／族群差異化的餐點，觸

發了工人的午餐抗爭。而在越南政府作為「工人國家」與依賴外資的政經脈絡下，具有維生道德意義的工人午餐抗爭促使政府開啟了與食物權相關的保護主義集體協議空間，試圖以受限的 7c/NQ-BCH 號決議來調解勞資階級對立關係。而此協議性質而非法律的議案，雖然賦予工人／會協議最低工作餐費的權利，但也讓工人的食物權高度依附於資方的善意與否。不滿於資方固守「吃得飽」的供餐原則，工人只好藉由每日的午餐政治持續的對台資抗爭施壓，爭取吃得好的得體午餐（午餐質量與公平性）。另外，劣質的工作餐通常是與台資工廠嚴苛的勞動條件共變，因此可藉由日常「吃飯」瑣事來開啟其他勞資議題的協議空間，具體化了台商所說的越南工人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叛意識。相當程度來說，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爭是結合了馬克思式和博蘭尼式的抗爭行動，工人午餐權利抗爭是交織在「勞動價值」的階級認同與跨越階級的「堅毅精神」民族認同之中；一方面，反對經濟剝削，抗議台資提供無法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劣質午餐以及占用工人的午休時間，另一方面，反對勞動力商品化帶來的個人和社會災難，抗議種族差異化的劣質工作餐所內含的對越南工人及社會的貶抑。

強制共餐得以在台資工廠中維持的因素，可以從資方、國家與工人三方面有關工作餐的利益傾向來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半邊陲台資為了汲取更多的勞動時間與確保勞動效能，於是採用強制共餐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衍生物，強制將工人的社會需求（進食）納入可控的範圍和工廠建構的秩序之中。而走向市場經濟的越南社會主義政府，以 7c/NQ-BCH 號決議之工廠集體共餐作為補償低工資的一種手段，試圖平衡保護主義和勞動力商品化兩項相互抵觸的利益。一方面，向工人表明維持社會主義保護工人的意識形態承諾；另一方面，也向外資表明，不會有更激烈反市場的國家干預政策，以免讓越南失去吸引外資的世界工廠地位。對工人而言，務實地認知到取消強制共餐實際現狀的局限性，於是以「批判性同意」（critical consent），持續日常抗爭的方式來接受集體共餐。相當程度來說，是資方、國家與工人之間非意圖的串連（complicity），制度化了越南台資工廠的工

作餐。

由於越南工人的午餐罷工與野貓罷工一樣是繞過工會系統，訴求也多數與「麵包和奶油」相關，通常對資方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和地方性的要求，往往能在當下阻礙工廠進行資本積累。有學者便質疑越南工人的這種行動主義，如何能發展成迫使資本做出更持久的讓步，或挑戰更廣泛的資本積累結構的工人運動？目前的抗爭形式儘管在當下能滿足實現要求，但卻會繼續重演，工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抗爭，以滿足基本要求（Bell 2017）。那這種經由持續騷亂而進行的集體談判，到底有沒有發生持久的影響？以越南工人的勞動條件來看，罷工使得工資增長，政府成立了國家工資委員會，設立年度最低工資固定制度，倡議集體協議制度等。工人罷工也曾迫使國家一級政策的改變，例如，推翻 2006 年和 2015 年對社會保險法的擬議修訂（Buckley 2021a），工人的抗爭不能說沒有實質的影響。以午餐政治來看，工人的抗爭的確是非常具體和接地氣的抗爭，也是一種經由騷亂促成集體協議，但卻未必沒有任何持久的影響，工人餐費的提升，食品安全的監控，能夠更體面的吃午餐，應該都是很難再回頭，只有更好，不可能更差。這樣的過程，雖然無法完全改變對立的勞資關係，但也產生了一些政治效果，工人行動主義給國家和資方帶來了改變現狀的壓力，一方面促使國家／總工會執行保護工人的職責（午餐決議的執行），工人／工會在制度上與資方集體協議午餐的賦權，工人便能透過一次又一次地抗爭—協議來促進「得體的午餐」的供應。另一方面，因午餐差異而強化了「我們越南工人」的群體意識與戰鬥意識，雖然無法「顛覆資本主義勞動體制」，但在勞資關係去商品化和去種族化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參考文獻

- 王宏仁，2019，《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徐遵慈等，2016，〈TPP 勞動專章對越南投資環境及臺商營運之影響〉，中華經濟研究院 105 年度國際政策經貿研究中心計畫（WTO 暨 RTA 中心計畫）。台北：經濟部國貿局、外交部。取自 <https://dokumen.tips/documents/tppeccef-ecce-ecfecioeoeoefoeeoeoeoioeoecc.html?page=1>
- 彭昉，2006，《宿舍、食堂與工作現場：珠三角工人的日常生活與生產政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ner, Mark. 2017. "Wildcat strikes and Better Work bipartite committees in Vietnam: Toward an elect, represent, protect and empower frame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World Bank Group (IFC). https://ilo.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41ILO_INST:41ILO_V2/1267879380002676
- . 2018. "Strikes in Vietnam." Pp. 63-80 in *Workers' Movements and Strik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örg Nowak, Madhumita Dutta and Peter Birk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 Bell, Eric. 2017. "Đình công tự phát: Wildcat Strikes in Post-Socialist Vietnam." Post by Chuang, <https://chuangcn.org/2017/05/dinh-cong-tu-phat-wildcat-strikes-in-post-socialist-vietnam/>
- Bohstedt, John. 2014. "Food Riots and the Politics of Provisions in World History." IDS Working Paper 444. Brighton: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Bourdieu, Pierre. 1982.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Paris: Fayard. 褚思真、劉暉譯，2005，《言語意味著什麼：語言交換的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
- Buckley, Joe. 2021a.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n Vietnam: A Heretical View." *Global Labour Journal* 12(2): 79-94.
- . 2021b. *Vietnamese Labour Militancy: Capital-labour Antagonisms and Self-organised Struggles*. London: Routledge.
- Chan, Anita. 2011. "Strikes in China's Export Indus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The China Journal* 65: 27-51.
- Chan, Anita and Kaxton Siu. 2016. "Strik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Vietnam: The Impact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Pp. 301-335 in *Labour Market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Vietnam*, edited by Ingrid Artus, Judith Holland, Uwe Blien, and Phan thi Hong Van. London: Nomos/Bloomsbury.
- Do, Quynh Chi. 2017.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Strikes and the Challenge for Union Reform in Vietna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8(5): 1052-1068.
- Do, Quynh Chi, Tran Tuan Doanh, Nguyen Ngoc Thuy, and Dang Thi Hai Ha. 2006.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and Trade Unions in Relation to Low Wages and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Findings of a research project 'Post-Socialist Trade Unions, Low Pay and Decent Work: Russia, China and Vietnam' fund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within its Non-Governmental Public Action Programme (Grant RES-155-25-0071). <https://web.warwick.ac.uk/russia/ngpa/VietnamReport.doc>
-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
- Gorman, Timothy. 2014. "Moral Economy and the Upper Peasant: The Dynamics of Land Privatization in the Mekong Delt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4): 501-521.
- Grignon, Claude. 2001. "Commensality and Social Morphology: An Essay of Typology." Pp. 23-36 in *Food, Drink and Identity: Coo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in Europe since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Peter Schollier. Oxford: Berg Publishers.
- Hobsbawm, E. J. 1952. "The Machine Breakers." *Past & Present* 1: 57-70.
- Hossain, Naomi and Ferdous Jahan. 2014. *The Food Riots That Never Were: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ecurity in Bangladesh*. Brighton/Dhak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Dhaka.
- Kerkvliet, Benedict J. Tria. 2010. "Workers'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with Some Comparisons to Those in the Pre-1975 South)."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5(1): 162-204.
- . 2019. *Speaking Out in Vietnam: Public Political Criticism in a Communist Party-ruled N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876.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ner. 吳家駟譯，1990，〈資本論：第一卷〉。台北：時報文化。

- Nguyen, Tu Phuong. 2018. "Labour Law and (In)justice in Workers' Letters in Vietnam."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5(1): 29-47.
- Pham, Quang Dieu. 2006. "Agriculture Sector of Vietnam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Human Development Madrid 2006. <http://www.reduniversitaria.es/ficheros/Pham%20Quang%20Dieu.pdf>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1999，〈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
-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程立顯、劉建等譯，2001，〈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
-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mel, George. 1994. "The Sociology of the Meal." Appendix, in Simmel's *Gastronomic Sociology: An Overlooked Essay*, translated by Michael Symons. *Food and Foodways* 5(4): 345-350.
- 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i, Kaxton and Antia Chan. 2015. "Strike Wave in Vietnam, 2006-201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5(1): 71-91.
- Symons, Michael. 1994. "Simmel's. Gastronomic Sociology: An Overlooked Essay." *Food and Foodways* 5(4):333-351.
-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沈漢、王加豐譯，2002，〈共有的習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Trần, Ngọc Angie. 2013. *Ties That Bind: Cultural Identity, Class, and Law in Vietnam's Labor Resist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ran, Hung Van. 2019. "Reasons Are Given for the Current Wildcat Strikes in Vietnam: The Blue-Collar Worker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0(4): 90-95.
- . 2022. "Strik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ern Key Economic Region of Vietn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1(5): 79-92.
- Tung, Phuong Huu. 2022. "The Living Wage of Workers in Vietnam."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Review* 6(S1): 328-339.

Watson, James L. 2011. "Feeding the Revolution: Public Mess Halls and Coercive Commensality in Maoist China." Pp. 33-46 in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The Quest for an Adequate Life*, edited by Everett Zhang, Arthur Kleinman, and Tu Weiming. London: Routledge.